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周恩来的最后十年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前言

敬爱的周恩来总理离开我们已经二十年了。二十年时间只是弹指一挥间。回首往事，许多情景依旧历历在眼前，就好像发生在昨天。

我作为周恩来的专职保健医生在他身边工作了十年多一点时间，而这十年恰恰是“史无前例”的年代……

周恩来为国家和民族建立的丰功伟绩彪炳千古。他不仅为中国人民所敬仰，同样赢得了世界人民的尊敬。

以前，曾有不少同志对我说过：“你在周总理身边工作这么多年，为什么不写一点东西啊？”

说实在的，要我写点医学科普文章还能凑合，可叫我写周恩来，确实勉为其难了，简直不知道从何写起与怎样落笔。

在周恩来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考虑再三，最后还是鼓起了勇气，决心拿起笔来写这么一本书以表达我对周总理的深切缅怀之情。

我将这些点点滴滴的琐事粗粗地写出来，让世人更多、更具体地了解十年动乱期间的周恩来和一直佩戴在他左胸前那枚小小的、长方形的“为人民服务”纪念章为什么闪闪发光，人民为什么至今仍然深切地缅怀着他老人家。

我是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中央领导人身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我的所见所闻极其有限，不可能全面，加之自己水平不高，但是，本书中写到的毕竟是我亲身经历的事情。

本书的面世，曾得到《中华儿女》杂志社主编杨筱怀、《中国作家》杂志社副主编杨匡满，上海人民出版社陈莉莉和陈敬山诸同志的一再鼓励和帮助，还有中央文献研究室力平同志的指点，我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由于成书时间仓促，且纯属个人回忆，无经典可引，亦无“红头文件”为凭，书中若有缺点与不周之处，恳请读者鉴谅，并提出宝贵意见，给予批评指正。

张佐良

1997年11月4日于北京官园

引子

我初到周恩来身边时，年近古稀的周恩来仍然是人们印象中的潇洒、精力过人的东方式政治家风范。

然而，在那疯狂的十年中，作为国家总理的周恩来扮演了一个“救火队长”的角色。全国几亿人被无端地卷进了这场莫名其妙的“大革命”之中，整个国家变成了一个大火药桶、大战场，经历着大灾难，几乎没有一个家庭

能够幸免。

“十万火急”的电报每天像雪片似地飞进总理值班室：请求总理制止武斗、恢复交通、释放被抓走的人，还有抗灾救灾……

周恩来原先的那些副手们，打倒的打倒、靠边的靠边，或徒有其位并无其权。于是，周恩来什么事情都得管，事必躬亲。

后人评说“文革”中的周恩来是苦撑危局，终于累垮、病倒、直至心脏停止了跳动。事实确是如此。

不仅如此，周恩来还要提防和抵挡那些超级“左派”们的明枪暗箭。

“文革”动乱初期，周恩来也同刘少奇、邓小平等人一样属于“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左”派们想方设法要整垮他，一时整不倒他，便鼓动那些不是有野心便是无知的造反派同周恩来日夜纠缠，以至周恩来首次发作心脏病。“左”派们又提出所谓“新文革”与“旧政府”、“中国最大的保皇派”、“××派的黑后台”等等，继续把矛头指向周恩来。

“九一三”事件后，周恩来抓住时机，解放干部，恢复生产，力图使满目疮痍的国家稍稍得以喘息。可紧接着进行的“批林”加上“批孔批周公”、“评法反儒”，并暗示中国有“最大的儒”和“投降派”，而此时操劳过度的周恩来已身染重病。

可以说，周恩来同“文革”这一场全中国人民的历史性悲剧苦苦鏖战了十年。他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并非钢筋铁骨。他的身心受到了极大摧残，终于卧病不起。他在癌症的折磨中，耗尽了最后一点精力，告别了人间。

1996年1月，为纪念周恩来逝世20周年，北京电视台播放了16集历史纪实片《伟人周恩来》。3月，有线台又播出了《周恩来与文艺》。这两部片子，全部采用实地拍摄，不用正式演员。那些曾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秘书、警卫、医护人员，那些亲切关怀中国文学艺术的扛鼎人物，提及周恩来的关怀，无不一个个声泪俱下。

毫不夸张他说，二十多年过去了，人们对周恩来的那份感情仍像昨天一样。同样可以说，不管你在那个年代初期曾否参加过这派那派，持有过什么观点，后来在周恩来这个庄严与亲切的名字面前，大家都有了共同的语言。这也是“四人帮”为什么成为全民公敌的重要原因。

在那十年中，我没有发现周恩来的头脑里有什么节假、休息，或是外出度假这类概念。

我所见到的他，只知道工作，工作，再工作，直到最后……

每年除了像春节那样重要的节日与少数“照顾”休息日，或是我病倒之外，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我可说是陪同他度过了那漫长难熬的岁月。

周恩来的许多活动场合，我是不能在场的，也是纪律所不允许的。我们中南海的工作人员都有这种自觉性：不该去的不去、不该听的不听、不该问的不问。不过，有时我会中间进去给周恩来送药，那也只是半分钟、一两分钟，只见到一些迹象，只听到片言只语而已。

因此，我不可能写出一个政治家的周恩来、外交家的周恩来与军事家的周恩来。我只能从周恩来的日常生活起居，他的健康状况，以及我所见到的他的喜怒哀乐，试图写出一个普通公仆的周恩来。如果涉及到了他的重大活动，那也只是我的匆匆一瞥。而且说实话，我在十年中见到的周恩来，主要是沉重、痛苦和忧愤的一面，很少见到他轻松愉快的时候。那是国家动荡、混乱、灾难深重的十年，充满苦涩的十年；因而，我的笔下写不出多少阳光

灿烂、欢声笑语及美丽如画的景象。

我想，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当年他抱病出席四届人大开幕式，向世人宣布中国将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如今这一目标已像群山之巅喷薄欲出的太阳，大海之上清晰可见的桅杆，已实实在在地向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招手了。

还可以告慰周总理的是，正是他认为“你比我强得多”的邓小平担当起了中国现代化总设计师的重任，提出了完整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并使全国人民团结在以新一代领导人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将一个举世公认的稳定、繁荣、迅速发展的伟大祖国骄傲地带进 21 世纪。

第一节

来到周恩来身边

“八一三”日寇飞机炸死母亲，父亲迫于无奈而自尽，我成了上海街头的“三毛”；我找到共产党参加了解放军，经过努力，走进医学院的大门

我出生在上海，1937 年爆发“八一三”淞沪战争，那年我仅是个 5 岁的小孩子，日寇飞机轰炸闸北火车站一带，我家开的小商店被炸毁，母亲当即身亡。开战那天，我和父亲恰好住在南市区故得以留下性命。但不多时，我们父子二人投亲靠友无着，身上一文不名，一时回不了乡下老家（浙江硖石），迫于要活命故无奈地住进了浙江同乡会办的难民所。父亲因受尽了亲友们的种种奚落和羞辱，使这个堂堂七尺男儿无颜面对江东父老，他终于服毒自尽，我便成了孤儿，继而成为地地道道上海街头的“三毛”。第二年，有人领养了我，把我带到苏北启海地区。

那时，日本鬼子占领着苏北农村，共产党领导的新四军和地方游击队抗击日寇侵略、保护人民利益。如今只有在《地道战》、《地雷战》等影片中才见到的鬼子进村时的情景便是抗战时期的真实写照。日寇时常到乡下进行大“扫荡”，“围剿”共产党新四军，实行“三光政策”，三天两头见到火光浓烟、耳边枪炮声不息，命案时有发生，什么叫“国破家亡”，什么是“水深火热”的亡国奴生活，我是切身感受到的。

地处长江下游的苏北启海地区农村，不同于山明水秀的江南田园风光，那里土地开垦的历史较短，土壤肥沃、雨量充沛，一块块长方形条田一年四季绿油油的，庄稼长势极好，尤其适宜于种植棉花。那里河沟纵横，人口密度不高，村舍排列整齐，呈现一派物富民丰景象。解放后，那里成为全国著名的棉花高产区。

日寇投降后，1946 年夏季启海地区实行土地改革，打倒土豪劣绅，翻身农民喜气洋洋，但好景不长。是年冬天，国民党军队向解放区大举进攻，地主老财组织还乡团尾随而来。敌人一来便抓人杀人、收回土地、反攻倒算，对共产党新四军、民兵、妇女会、贫下中农，甚至儿童团进行报复。反动派军队由土生土长的还乡团引导，他们的报复行动屡屡得手。苏北老百姓再次遭受劫难，农民纷纷参加新四军同国民党进行武装斗争。大多数年长我几岁

的小伙子加入新四军主力部队去打大仗，我随后参加了新四军地方武装打游击。

1949年渡江作战前不久，我所在的新四军地方武装“东南警卫团”，此时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苏北军区警备二团，被编入正规部队序列。

渡江作战前，部队不仅改了番号也换了着装。原来新四军穿的灰布制服一律改穿草黄色军装，军帽上缀一枚金黄色边的红五角星，左胸前缝上一块8×4厘米布质、白底、红框、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的标识。我们部队参加了解放崇明岛战斗，结束剿匪后驻防崇明堡镇港，后移防南通市。

全国刚解放，天安门广场的礼炮声响完没有多久，1950年6月，朝鲜战争就爆发了，且战火很快蔓延到鸭绿江边，威胁到我国的安全。唇亡则齿寒，举国上下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抗美援朝”运动，政府迅速组成了志愿军部队，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投入到“保家卫国”战斗中去。

1951年底，我也请缨参加抗美援朝，获准后被编在新组建的华东军区新兵第三十八团，排以上干部开拔到徐州附近集训待命，后因板门店和平停战谈判有转机，1952年8月，按照上级命令，撤销三十八团建制，所属人员一律返原单位。我未当成志愿军，没有到过朝鲜前线成为终身憾事。

朝鲜战争即将和平解决，仗快要打完了，今后，我干什么呢？这个问题不时地出现在我的脑海里，赶也赶不掉。

当时，政府接管了国民党留下的一个烂摊子还不久，国家正处于经济恢复时期；为减少国家经济负担，军队要实行精兵简政，既然不打仗了，国家就不需要那么多部队了。部队首长动员部分指战员要响应祖国的号召，服从命令听指挥，由上级统一安排复员或转业，积极参加和平时期的经济建设，且有少数部队成建制（以师为单位）地开到祖国边疆屯垦戍边。上级领导找我谈话，跟我讲明道理，指明有三种选择：复员、转业，或是上学去。我一听，毫不犹豫地选择上学去。这一年冬天，我到上海第一医学院筹办的卫生干部学校（简称“卫生干校”）报到，学习数理化一年。

根据中组部、高教部及卫生部联合指示精神筹办这所学校的宗旨，是从军队及地方在职干部中招收学生，培养卫生行政管理干部。招生对象为年龄在25岁以下、共产党员和五年以上军龄的优秀卫生干部，通知发到各专区人事与卫生主管部门。那一年，我刚20岁，其他条件亦符合招生要求，故从军队转业到南通专区等候上医卫生干校入学通知书。

在等通知期间，先到专区卫生科任行政22级科员工作，其时，军队仍实行“供给制”，地方已改为“包干制”，每月发给我28元人民币，包括吃饭、穿衣等一切生活费用都在内，缺少不管，多者归己。那时物价便宜，在南通市每月交上六七块钱伙食费便吃得蛮不错了，当然只是吃些猪肉、豆腐和蔬菜之类。

城市里各影剧院对军人实行优先购票，且是票价减半。我转业到了地方虽说享受不到军人半价等优待，由自己掏腰包买全票，但周末看电影或京戏还是不成问题的。因为部队正处在精兵简政，以压缩军费开支时期，苏北军区与南通军分区部队停发了菜金，令部队“生产自给”，即自己种菜、养猪养鸭及捕鱼捉蟹等来养活自己与改善生活。

我当了几年兵，习惯于纪律严明、生活紧张、办事干脆，与人相处坦率而不用心计，刚到地方机关工作感到不习惯，有点适应不了。一般说来，那时地方机关干部的文化水平要比部队干部高些、知识分子多些，有的说话

慢悠悠、文绉绉，比较含蓄，甚至拿腔拿调，显得城府较深，真使人难受。半个世纪快要过去了，我那缺心少机、直肠子脾气至今仍改不过来，为此亦吃过不少苦头，真所谓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啊。不过，年过花甲的我，无论在大学或其他工作单位还是有些好朋友，因为有人愿意交我这样的朋友，这大概属“鱼找鱼，虾找虾”之列吧。这些都属后话，这里就不多说了。

没有多久，我们便接到了上医卫生干校的入学通知书，专区卫生科的同事们向我们表示祝贺，他们中许多人都以羡慕的眼光与我们握手道别。

我们从南通天生港登上开往上海的轮船。同行者三人，都是转业军人。我们坐的是三等舱，身上穿的是藏青色棉布中山装。头戴棉军帽，脚穿黑棉布鞋，在上海人的眼里我们显得有点土里土气“乡巴佬”似的。我虽说是个“老上海”，但离开上海漂泊14年，如今回到上海来读书，真可说一声：嗨，上海啊，我们久违了！

第二天早晨，轮船将要在外滩码头靠岸的时候，我们急忙从船舱里跑到甲板上面来看热闹。昔日大上海的高楼大厦立刻映入眼帘，依旧矗立在黄浦江西岸，路上行人来去匆匆，车水马龙热闹非凡。

不过，今非昔比，物是人非，上海，这个曾经称作“冒险家乐园”的东方大都会，如今已是人民当家作主了。

登岸后，因不熟悉上海市的环境与交通路线，我们只得叫了两辆三轮车把我们拉到学校去报到。

刚解放那阵子新旧社会对比明显，共产党和解放军在人民中的威信很高，群众的觉悟高，市民拥护人民政权。三轮车夫既不“拒载”，也不“斩客”，价钱公道，将我们顺顺当当地拉到了兴国路。

一路上再也看不到从前那些趾高气扬的外国佬、美国水兵及看大门的“红头阿三”。原来的江西路工部局大楼门口，挂上了一块白底黑字“上海市人民政府”的大牌子，这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象征。我在上海虽说已是个无家可归者，生我养我的父母早已被日本侵略军害死，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培养我成长的人民和共产党带给我的温暖与阳光。

上海第一医学院附属卫生干部学校设在兴国路72号一座豪华漂亮的花园洋房里，那是个闹中取静的好地方，环境幽雅，院内树木森森、绿草如茵，足球场般的大草坪，还有一个游泳池。看到的这一切真叫我一时难以置信，对我这个曾经是上海街头的流浪儿来说，这一切绝不是梦，是确实确实的存在。在卫生干校任教的老师大多是上海第一医学院各系教研组抽调来的优秀教授、讲师与助教，老师教得认真，学生学得刻苦。

在部队里我被人叫了多年“小鬼”，到上医卫生干校后，仍是个小不拉子，“小”字辈的名分看来还得继续下去。来报到的学生中有三四十岁的“老干部”，他们是什么科长、处长，有个别老同志已是副厅长的“大官”。其中不少人已是拖家带口的，还有几位长期患慢性病、经济拮据、家庭生活困难者。那些从北方来的干部对南方的气候、环境及生活方式，尤其是饮食不习惯。他们吃惯了面食，不喜欢吃大米。这些同学中，后来因未考取大学等原因而陆续退学返原单位工作。当时未经意，后来才发现学生的年龄及职务构成已突破“招生原则”的规定。

开学前，卫生干校对学生进行了注册登记和摸底文化测验，按成绩将同学分成甲乙两个班，规定甲班学生补习文化一年，乙班补习两年，我被分配在甲班，所学课程同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语文五门课。我们的数

学课程从高小“四则题”(整数、小数和分数)学起,然后学习代数及几何等。

按学校原先的设想,我们这一届学生,只要毕业考试合格,就可由卫生干校“保送”高等医学院校公共卫生系就读。可是,就在我们临近1953年暑期毕业考试前,学校接到上级指示:为保证大学教学质量和教学进度的整齐,无论是军队或地方来的调干生、文化补习班学生,一律要参加暑期全国统一高考招生,无一例外。据说,高等教育部听取了各大学的汇报,前两年由于调干学生文化水平参差不齐,入学后功课跟不上教学进度,学习起来相当吃力,不能与应届高中毕业生同步前进,即便是不断地补课与辅导,个别调干生每学期仍有几门功课不及格要补考,弄得教师费力,学生吃力。调干生的心理压力太大,导致一些人吃不好睡不香而得了神经官能症,故有此新规定。

上级要求调干学生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新规定确有道理,可苦了我们上医卫生干校这一拨儿了。本来,只要干校毕业考试合格便可以直升上一医公共卫生系深造,现在得临时抱佛脚,再补课应付全国统一高考。那时没有走后门这一说,大家都得老老实实参加卫生干校毕业考试后,再立刻按全国统考要求补习新课程。

卫生干校的教师们马上忙看赶写新的讲义,还尽力收集解放后恢复高考以来历届高考试题,油印后分发给我们作参考。

当时,像我今天这样年岁的老教授,在那酷暑难当的日子里,教室里不要说空调机,连电风扇都没有。六十多岁的老教授们白天上课,晚上还要辅导学生补课答题。他们满头大汗,站在黑板前,吃着粉笔灰,认真地给我们这批“调干生”,或许该称之为“老学生”补习数理化。

同学对此感激之余,也学习得很艰苦,往往到深夜十一二点钟仍坚守在教室里“拼命”。

学校领导怕我们精神负担过重,再闹出点什么病来,他们常到教室来赶我们回宿舍去睡觉。我们几个年纪轻一些的学生则采取跟领导“打游击”的办法,听说领导要到教室来检查,便急忙躲起来,待“风声”一过再溜进教室去学习。因为宿舍里不仅房间小,而且更加闷热,还怕影响他人睡眠,或被人“揭发”不睡觉挨批评。

卫生干校的领导积极向上级有关部门请示后,同意我们这一届干校毕业生,万一考不上大学者,只要本人愿意,可以再补习一年文化,第二年再给一次参加高考的机会,我们听了不胜感动,像是吃了一颗定心丸,但并未因此而松懈斗志,而是更加刻苦地参加补习,力争一次成功,就在这一届考上医科大学。

1953年,上海夏天的天气热得邪乎,既不刮风,也不下雨,身上衣服总是汗湿的,因为班上还有女同胞,不然我们肯定会光着膀子在教室里“开夜车”。幸好,校园里有一个游泳池,热得实在熬不住了,大部分男同学跳进游泳池里游泳,像我这样在河沟纵横的长江边上长大的乡巴佬,不会蛙泳、蝶泳或自由泳等姿势,但都识水性,能在水里划拉几下不会被淹死。我们一律都是“狗爬式”,在游泳池里嬉水打闹,轻松快活,凉快一阵子,再出来鏖战数理化!卫生干校已经放了暑假,乙班同学大多回家、看电影、逛商场、荡马路,轻松愉快,悠哉游哉。学校为了暑期后招收新生,让甲班同学腾出兴国路宿舍,安排我们住到了东湖路宿舍(东湖电影院隔壁)。另

外，在马路对面，曾经是上海市委招待所，现叫“东湖宾馆”的地方借了一间大房子作教室，继续补课一苦斗”。

在这期间，我们学习中遇到一个共同的难题便是数学课程，数学学不好，也就增加了学习物理的难度，特别是力学部分。一天下午，我们在教室里正聚精会神地听孙教授讲过去历届高考数学试题，一面讲一面在黑板上写公式，他讲演算题时不只讲的速度快，在黑板上写的速度也快、擦黑板的速度亦不慢，我注意了一下，几乎是写两行就擦掉一行，令听课者目不暇接。我们一会儿抬头注视黑板上的公式变化，一会儿又低头作笔记，真是抬头低头忙得不亦乐乎。突然间，从头顶上发出咔嚓一声清脆的巨响，好像房顶立刻劈头盖脑塌下来一样。教室里的人惊恐之际不由自主的头颈转向右侧朝窗外望去，只见不远处一座蓝色圆顶教堂上火光一闪，一个金黄色的大十字架冒出黑烟，顷刻间那个十字架便不见了，令人膛目结舌，老师和同学都愣在那里……过了一会，人们又叽叽喳喳地议论开了。

“大家静一静，回到刚才我讲的那个题目上来： $a + b + c = \dots$ ”孙教授开始讲课，他想把大家的思绪拉回来。

后来，我终于高考“及第”。我们是卫生干校培养的第一期毕业生，上海第一医学院和上海市文教卫生部门的领导都很重视。1953年临近暑期高考的时候，我们甲班全体同学集合在教室里，静静聆听校领导根据每个人的毕业考分，向大家宣布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名单。我感到荣幸的是本人的名字被列在其中，校领导给我们分发了报考大学的“志愿登记表”。数日后，在上海交通大学“文治堂”参加全国高考。

那时，高考录取生的名单公布在报纸。分两批发榜，第一批刊登名牌大学（即现在的重点院校）录取的第一志愿学生名单；第二批为被取生。第一批名单发榜时正值头伏、二伏，天气闷热异常，同学们的心更热，人们都满头大汗地跑到学校图书馆去拿报纸，急着按自己填报的志愿寻找学校与专业。别人很快都找到了各自的名字，我却“榜上无名”。我心里着急，不由得有些灰心丧气。

第二天上午，我又去图书馆看报纸，在自己填写志愿的学校栏内逐行仔细地找了一遍又一遍，心急火燎的就是找不到，我失去了信心，一副神情沮丧的样子。我的几个好朋友陪着我安慰我。他们说，没有关系，大不了明年再考一次。可我的心里实在觉得不好受。自己心里想，平素学习刻苦努力，在班上成绩还算不错，高考当天向监考老师交完最后一份答卷时的自我感觉也还可以，怎么会没有我的名字呢？真是想不通。由于情绪低落，夜里睡不好，白天吃不香。这天下午，两位年长我几岁的同学陪着我到马路上散步解闷，沿兴国路朝淮海路方向走去。在临近淮海路一个弄堂口的阅报栏前驻足，看到那里还有昨天的旧报纸没有换掉，我的一位从苏北来的学兄黄志坚又到报纸上去搜寻我的名字，我因为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出现，故只是离阅报栏稍远处呆呆地站立着。

“小张，你的名字找到了，在这儿呢，快过来看啊。”过了一会儿，忽然听到老黄大声地喊道。

我还是站在那儿发愣，不相信他的话，没有移动脚步。

“喂！你是怎么搞的？我叫你过来看，你怎么不来啊？我会骗你吗？”他有些生气地说。

老黄不仅是年岁比我大些，他学习好，人品好，在同学中威信高。他

很少同我开玩笑，他还是我们的学习班长。经他这么一催，我急忙奔了过去。

“你看，你的名字就在这儿，你考取了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他用手指着我的名字说，“我是上医公共卫生系，我们以后仍然是同学。”老黄后来是我们大学共青团团委书记，马列主义教研室主任。

我顺着他的手指看去，“张佐良”三个字赫然在目，原来榜上有名！我的心一下子怦怦地跳着，我怎么会看走了眼，找不到自己的名字呢？

“小张请客，买棒冰！”另一位同学提议。

此时此刻，我当然非常高兴请客了，不远处就有卖棒冰的小贩，我们每人吃了三根棒冰。只可惜，当时大家都是“调干生”，拿的是助学金，囊中羞涩，要不然，我一定会奢侈一回，请他们到国际饭店去吃一顿。

上海第一医学院医疗系本科是我填写的第一志愿，是我最理想的大学和专业，真是喜出望外。头一天夜里由于“榜上无名”弄得自己心烦意乱而睡不好觉，这天夜里因“榜上有名”而兴奋激动又睡不好觉。一时间浮想联翩，旧社会像我这样一个孤苦伶仃的穷小子是不可能上大学念书的，每天能够吃饱饭活下命来就不容易，还谈什么读书。昔日马路上流浪的“三毛”，现在进了高等学府。我曾经连做梦都梦不到的好事情竟然成为现实，我非常珍视视觉和人民对我的培养，给了我这一难得的机会。

暑期，很快便过去了，考上大学的同学纷纷离开卫生干校去报到。当时的我，可说是壮志凌云、豪情满怀、憧憬着无限美好的未来；自己的理想与追求实现了，我的生活开始了新的起点。那枚小小的、长方形、由我国著名书法家舒同书写的白底红字的“上海第一医学院”校徽别在我左胸前，它，赫赫生辉，令我感到无比的自豪。我一生中没有什么辉煌或闪光的事迹，但我无论在战争年代、大学生活及此后的工作中始终努力工作、刻苦地获取各种知识、勤奋学习至今不辍。

丰富多采、生动活泼、紧张愉快的五年大学校园生活是我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也是受益最多的时光。

五年间，尽管有“肃反”、“整风反右”、“大跃进”以至“拔白旗”等政治运动，但我们的教学生活未受到太大的干扰，按时完成学业，走向新的工作岗位。

50年代初，我国实行一边倒，全面学习苏联，留学苏联成为一股风气。那时领导上亦曾有意培养我，动员我到北京学习俄文，日后留学苏联，我没有动心。其实，那时我见到别人去苏联留学，心里也是挺羡慕的。我并非不想去苏联留学，只觉得自己文化基础差，能在国内大学学好专业就不错了。1956年，有一位苏联著名内科专家到上医来传授先进教学经验，他们时兴带病人到大课堂作示范讲课。几次下来，老师和同学中对此印象不佳，但保持沉默不敢妄加议论，不然给你戴上一顶“崇拜西方”、“反对学习苏联”的帽子也够你呛！

第二节

北京医院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保健医生的“摇篮”

1958 年暑期，我们结束了医院里的实习课程回到学校等待毕业分配。同学们对于刚刚经历过的 1957 年夏季“反右派”运动心中还是记忆犹新。毕业分配时正值“大跃进”高潮，社会上政治气氛浓浓的，学校领导号召应届毕业生服从分配，到边疆去、到农村去、到最艰苦的地方去、到祖国社会主义建设最需要的地方去。上医同学中大多是上海人，或家乡在江浙地区中小城市，学校担心同学不愿离开上海，统一分配工作有一定难度，故一再强调党团员要带头服从分配，贴大字报表决心，主动请求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锻炼。但向往留校当助教、到上海大医院或科研单位等条件优越的部门去工作，是很自然的，我也一样。

我们这些调干学生平素在学校的各方面表现都是比较像点样子的，无论是关心和参加各项社会活动，农忙季节大学生下乡劳动、到农村去参加血吸虫病防治工作，以及参加“劳卫制”体育锻炼等都起到了表率作用。但是，服从国家统一分配，要求到边疆、农村与最艰苦的地方去工作，这是一个极为关键的考验。

50 年代是国家高度集中统一的时代。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大学生的培养与分配同样是有计划按比例，并且是一次分配几乎决定了终身的前途和命运。当时，我考虑到自己是孤儿出身、转业军人，人民培养我成长，我是共产党员，又是学校党团干部与骨干，没有理由不响应上级号召，在服从统一分配工作问题上必须作出榜样，不能考虑个人利益太多，不能退缩。我历来认为一个人的行为要表里一致，说的和做的必须是一个样子，心口如一，叫人口服心服。在面临这样一个关键时刻，群众看党团员，党团员看干部。因此，我带头签名贴出大字报表态：响应党的号召，坚决服从国家统一分配，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就这样，我从上一医毕业便告别母校到河北省中医学院报到。

大学毕业时，正赶上“大跃进、人民公社、大炼钢铁”年月。先后来河北省中医学院报到的大学生有二十多名，共产党员只有我一个。单位领导指定我为“负责人”、“小组长”，这些自然不是什么“官衔”。

从秋天很快到了隆冬季节。我们这些人当中大多是“三门干部”（由家庭、学校到机关），有的从未离开过家庭和父母，没有吃过什么苦，独立生活能力差。

北国的冬天真是千里冰封，刺骨寒风，吃的是粗粮多，如小米或玉米面窝窝头，大米与白面少；大白菜成为当家菜，肉食很少，更见不到鱼虾。我们白天夜里拉小车运铁矿石，用大小铁锤砸碎矿石送进土高炉内“炼钢”，每天劳动到深夜，可说是风餐露宿与劳动人民跌打滚爬在一起；那些缺乏劳动锻炼基础的“资产阶级小姐、少爷”们十多个小时干下来，腰酸腿疼几乎直不起脊梁骨，其艰苦情形可想而知。但辛苦的结果是炼出来一块块大小不等、样子难看的废铁疙瘩。此时，难免听到人们满腹牢骚，怪话连篇，他们都不把我当“外人”，心里有话说在当面，有意见就提。

在大学时期，政治老师给同学讲形势时曾说我们中国缺医少药，不仅农村，即使在城市里高等医学院校毕业的医生也不多。所以，医大毕业的学生，应当去看病，不该学非所用，每天在此炼出一大堆废铁疙瘩，浪费我们的青春年华。以实事求是的观点来看待问题，他们说的是事实、有道理，我凭什么去批评他们、指责别人？我也是吃五谷杂粮，心里边想的同他们是一

样的。不过，我是党员，我要比他们克制一点自己的言行。在这种情形下，我只得用一些无关紧要的言词去跟他们打岔，免得他们说得太过头而引火烧身，惹来麻烦。

在经历了学习中医、下乡劳动和巡回医疗队等生活两年零八个月后，北京医院通过卫生部同河北省委商调我到北京医院工作，使我能同家人团聚，感到很高兴。

北京医院是直属中央卫生部领导的一所高级干部医院，可以说是党中央领导人保健医生的“摇篮”。老一辈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大多数在这里受过熏陶。以前，北京医院的院长由卫生部副部长兼任，著名战伤外科专家崔义田副部长曾长期担任院长，医院副院长大多兼任卫生部保健局副局长职务；医院专家阵容强大，设备先进齐全。如医院有闻名于世的血液病专家邓家栋、胸外科专家计苏华和心脏内科专家吴洁等，他们早年留学美国名牌大学医学院，学成回来报效祖国。这正说明党中央对北京医院的重视。

历年分配到北京医院的大学毕业生都在这里接受上级医生严格的指导，培养良好的医风，高尚的医德，精湛的医术，学习随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应注意的外交礼节等方面的知识，使他们日后到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时具备较高的素质。

北京医院位于北京市东交民巷，是个闹中取静之处：解放前，东交民巷曾经是一个外国佬享有特权的地方，是旧使馆区。北京医院前身是德国人创办的一所私立医院，它服务于达官显要、军阀和资本家，是有钱人的天堂，他们在这里看病、吸毒和解毒。它也是权贵们的政治避风港。

解放后，人民政府派军代表接管了北京医院，将它逐步改造成干部医院。在全面学习苏联、向苏联一边倒的年代，请苏联专家到医院指导工作。60年代，中苏关系破裂、苏联专家撤走，医院开始了自立自强自建的历程。

我进北京医院的时候，它还只有一座深灰色三层德国洋楼及东楼，人们惯称它为红楼。

历经三十六年沧桑后，尤其是随着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如今的北京医院早已旧貌换新颜。

原先那些旧式小洋楼均已荡然无存、拔地而起的门诊楼、住院楼、干部病房及辅助建筑等高大楼群布满了整个院落。

北京医院不仅外貌发生了巨大变化，内部设施和设备亦都更新换代，管理措施及各项制度建设亦符合时代潮流与改革开放同步进入现代化。

医院的人事变迁就更大了。如今，像我这样的北京医院老人到了医院还真有点像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走进大楼东南西北难辨，想找的科室与人不易找到，并且关卡重重此路不通。

由于生人多熟人少几乎是逢人即被拦、被挡，往往弄得寸步难行，听来好像是笑话，其实也是好事。时代大大进步了，事物都在新陈代谢。我依旧为我曾工作过的“母院”向前发展而骄傲。这，当然是后话了。

“文革”时期，像北京医院这样理应受到保护的重要单位亦未能逃脱这场灾难的洗劫。

“文革”一开始是揪“黑帮”、“反动权威”和“走资派”。

到了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之后，几乎是一夜之间，医院院长、党委书记、党委和行政系统的领导干部，各业务科室主任，特别是那些专家一下子被夺了权，靠边站，有的还被挂上牌子亮相和揪斗。可笑的是造反派

自上而下地夺权，甚至连工会小组长的“权”也被夺走，真是乱了套。

北京医院在“文革”中领导干部挨整最典型的例子是计苏华院长。他 30 年代在美国留学期间便接近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接受马列主义等进步思想的影响。他为我国医疗及卫生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计院长对北京医院的贡献可说是功不可没，他从全国选调了一批医学专家、医生、护士等技术人员。计苏华院长业务精湛、医德高尚、为人厚道，医院同仁中口碑极好。他本可在医疗、教学或科研等方面大有发展前途，而他却甘为人梯，将业务发展与技术提高的机会让给他人，自己默默无闻地做着大量的医务行政工作和保健工作的规章制度建设。就是这样一位难得的“双肩挑”好党员、好干部，亦遭到了厄运。

“文革”风暴一开始，造反派就给计苏华院长扣上了“走资派”、“黑帮分子”、“反动权威”等许多大帽子，把他揪出来示众。他的家不知被抄了多少遍。其时，他已是花甲之年了。他的脖子上被挂着写有那些显赫“头衔”的沉重大胆子，到处大会斗小会批，白天晚上车轮战。后来，造反派认为他的威风已被打掉，把他看成是已经定了“性”的一只“死老虎”关进了牛棚。但他仍要每天与“同伙”出来站成一排亮相，对着毛主席像“请罪”。他白天打扫厕所和院子，虽不再被作为主要批斗对象，但他还要参加陪斗。他，一位有名望的专家、学者和领导干部，最后惨死在江西“五七”干校。

第三节

中南海历经百年沧桑，新中国的中南海依然是政治权力的中心；“文革”中，党中央三令五申，不许在中南海搞“四大”

1962 年 1 月 3 日，我从当时的河北省会天津市调来北京医院工作前，医院面临扩建任务，需要增加专业人员编制，正向各地选调医生、护士。他们向我介绍了北京医院是一所高干医院的性质及任务。它的服务对象除党和国家领导人外、还有高级民主人士、专家学者等高级知识分子以及文化艺术界的著名人物。

在北京医院工作一段时间后，我常见到一些熟悉的医生、护士陪着党中央领导人来医院作健康检查、看病或住院。这些革命老前辈、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是我非常敬重的人。因此，我认识到保健医生的工作十分重要，真是了不起，太幸福了。他们有机会跟随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还能经常出入党中央办公重地和毛主席居住的地方——中南海。由此，我对他们产生了敬意，也有点羡慕。其时，我当然还没有体会到在伟人身边工作固然有许多令人尊敬与羡慕的地方，但也有责任，有压力，还有不少难以言喻的酸甜苦辣！

我到北京医院工作两年后的 1964 年，毛泽东对卫生部保健工作提出了严厉的批评。他指示：撤销卫生部保健局，取消专为党中央领导人服务的中南海保健组，医护人员全部回到北京医院重新安排工作，北京医院必须对外开放，面向一般干部和群众。实际上是对领导干部在某些方面脱离群众的状况提出了批评。

卫生部党组与国务院主管卫生工作的领导人对于毛泽东的指示岂能置若罔闻？只有坚决照办。于是，从党和国家领导人起带头撤销了原有的专职保健医护人员。然而，中央领导人的工作繁忙及其特殊性，他们没有时间，也不可能到医院挂号排队候诊看病。为此，北京医院临时设立了一个“总值班室”，医护人员24小时值班，准备随叫随到及时应诊，解决领导干部看病难的问题。

此时，领导上选定了一批年轻的医生护士接触与熟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以便逐渐接替老的保健医护人员，同时，对保健工作制度进行了改革。我是被选定的医生之一。领导上要我慢慢接触和熟悉中央领导同志的保健工作，有时亦为外宾服务。此后，我也成为党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医生。

由于工作需要，我经常出入中南海。我心中开始对红墙内的那种神秘感与好奇心渐渐地被工作的重要性、责任感与巨大的精神压力所取代。

从前，中南海不仅是一座皇家园林，一处名胜古迹，也是一个名声显赫的政治权力中心。我国历史上那个恶名昭著的慈禧老佛爷光临中南海紫光阁等地；光绪皇帝被囚禁在瀛台；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勤政殿谋划皇帝梦；后来，国民党的许多大人物如李宗仁及何应钦都曾驻跸中南海；一直到解放前夕、兵临城下之际，傅作义亦居住在中南海。

但是，中南海历经百年沧桑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地接管了北平城。中共中央从北平西郊迁进中南海时，它早已没有了昔日皇家花园的幽静与辉煌，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是满塘污泥、臭气熏天、树木凋敝、房屋陈旧等一片破败不堪的景象。

党中央进入中南海之前，先派了一批部队疏浚河塘、挖出成百大卡车淤泥，清理垃圾，打扫房屋及院子。周恩来因公务繁忙，会议不断，向他请示工作的人多，他要找的人也不少，住在郊外每天路途往返实在耽误时间，很不方便。当然，周恩来亦为日后党中央进驻中南海做好各方面的准备工作。所以，周恩来是党中央领导人中最先住进中南海办公的。他刚进中南海时住的便是日后毛泽东居住的丰泽园菊香书屋。当周恩来把保卫措施、环境卫生及生活设施等一切事情都安排妥当之后，方请毛泽东与党中央领导机构迁进中南海。周恩来则另觅住处，这便是后来人们熟知的中南海西北角，贴近府右街的西花厅。

新中国的中南海依然是政治权力中心，不过，它已更换了主人。居住在那里的已不再是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欺压百姓的太上皇，而是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邓小平、董必武与陈毅等一批代表人民利益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中南海已成为全国人民敬仰并寄托希望的神圣地方。待至我进中南海工作的时候，每年“三八”妇女节后，湖面开始化冻，湖水碧波荡漾，湖边垂柳轻拂；院内林木苍翠、绿荫如盖、芳草成茵，已是一个庄严幽静的园林。

“文革”初期，中南海也着实热闹过一阵子。那场动乱一开始，只见“红卫兵”与造反派冲击学校、文化机关，特别是冲击文艺团体、军事院校、党政机关。后来，形势不断地恶化，“红卫兵”、造反派劲头足胃口大，动乱的势头逐渐扩展到工厂，影响工厂妨碍生产；冲击到机关，则使正常工作受到严重干扰。为了稳住中南海内部不致被波及，使党中央领导机关有一个稍为安静的工作环境，故中央三令五申：中南海、人民大会堂和钓鱼台不许搞“四大”（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

但是，中南海里的人也不是生活在“真空”当中。再说，“中央文革小组”的重要成员之一戚本禹，就是党中央办公厅的工作人员，其时名声显赫，气焰十分嚣张。外部社会的各种思潮冲击着中南海，里边有一小部分人抵挡不住这种冲击力。同时，他们也出于种种原因，最起码是不愿当“臭老保”（保守派）。他们也要起来“革命”，一腔“革命”的热血沸腾起来了。

因为“文革”动乱一开始时的口号就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一些人开始写大字报。自然，他们最保险的做法是，把矛头首先指向“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刘少奇与邓小平。这是“革命斗争大方向”，谁也无法反对或提出任何异议。你若贴出这一类大字报之后，没有人来责难你，上头亦没有人出来干预。这便可证明自己的行动是“革命”的，因而是正确的，合法的。然后，再将斗争矛头指向其他人。于是乎，不几天就贴出了朱德是“黑司令”、“火烧××”等一批大字报。

后来，这些人的头脑开始膨胀起来、不顾上面“三令五申”不许在中南海里面成立“战斗队”等造反组织的禁令。他们照样成立战斗小组、战斗队等“革命造反组织”，并采取一系列“旗帜鲜明的革命行动”。他们本是中南海里的人，熟悉“海里”的情况。他们组织批斗“最大的走资派”和夫人们，可说是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条件。但他们错了。他们违反了禁令，竟敢在禁区里鼓噪，闹腾。周恩来闻讯，怕事态扩大不好收拾。他只得“以无产阶级司令部”的名义很快采取必要的措施，并做了大量耐心细致的说服教育工作，采取了一定的组织措施，方在较短的时间里制止了事态的发展。

他下令解散那些“非法组织”，中南海内的这股力量被迅速地扼制住，没有发展起来，最后便渐渐销声匿迹了。

内部的造反派被遏制住了，而外面的“红卫兵”运动发展势头正方兴未艾，一浪高过一浪，高潮迭起。

1966年“八·一八”，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首次接见“红卫兵”以后，于8月31日第二次接见“红卫兵”时，他老人家明确地表示支持“红卫兵”的全国大串联行动。

消息见报后，全国各大中城市学校的“红卫兵”自然兴奋若狂，真像开了锅一样。因为上面规定学生们串联时的吃、住、行一切免费；学校宣布停课闹革命，学生们不仅没有了考试之“忧”，而且可到全国各地参观游览，这样的好事何乐而不为呢？

于是，离北京近且交通方便的那些城市率先带队如潮水般涌入首都，每天多至几万人，高峰时，每天进出北京的“红卫兵”数量达到150万至170万人之多！

那时我正在周总理处工作，全国铁路交通运输情况十分紧张，简直是“乱”了套，各地铁路交通部门不断向总理值班室告急。“红卫兵”大串联使北京各大中小学的教室、礼堂、饭厅，甚至车站、码头及广场等地都挤满了学生。是年秋末冬初，南方来京串联的青年学生，身上衣着单薄，不适应北方的季节气候，加之旅途劳顿，饮食不周等因素，引起呼吸道与肠胃道传染病流行；北京各医院凡是能呆人的地方……包括走廊上都躺满了病人。

这年冬天，铁道部长吕正操“失踪”了好几天……他被造反派揪走后藏了起来。周恩来一时弄不清是哪一派揪走了吕部长？究竟被扣押在何处？是否安全……周恩来既着急又担心。过了两天，在一个寒风凛冽的深夜里，吕正操终于来到了西花厅。记得1965年冬，吕部长作为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随邓小平一起，由北京出发前往云、贵、川视察三线建设工程。

当时，他看上去还算是个中年，身体健壮，精力充沛。仅仅时隔一年不见，他可瘦多了。此时我看到的是，他长长的胡子茬，一副疲惫不堪，似有好几天没有睡觉的样子，大概是造反派把他折磨得够呛。

吕正操到总理这儿倒是蛮随便的……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来的时候正好是总理家的水果青黄不接之时。并非我们随员小气不肯拿水果招待他，以茶水和水果待客是周恩来家服务人员起码要做的事情。那天夜里，我们给总理留下一个仅有的大橘子，洗净后搁在一个碟子里放进玻璃橱，准备在后半夜给总理吃。

吕正操来到我们工作人员值班室，进门后靠放电话机的二展柜旁坐了下来，他一眼便看见了玻璃橱内那个大橘子。

他倒好，毫不客气他说：“我也造总理一个反！”他说着话，站起身来自己拉开橱门拿着橘子剥皮就吃。

哎，我心想，真有你的，吕部长，你一点也不客气！真跟到自己家里一样啊。他刚好吃完橘子，总理就把他叫进办公室去谈铁路交通中断等事儿去了。毛泽东请来了那么一大批客人，北京市前后接待了一千一百多万“红卫兵”。这个庞大的数字造成铁路、交通、车站、码头拥挤堵塞，不堪重负。铁道部与交通运输部门叫苦不迭，即使放下所有其他的运输任务，亦难完成这个巨大的超负荷运输任务。于是，各地方交通运输部门与铁道部纷纷向国务院告急，情况汇总到西花厅，把难题交给周恩来处理，而周总理又怎么办呢……

“一月风暴”后的夏季开始，北京成立了所谓的“揪刘火线”——中南海四周插满了标志各造反派组织的红旗，数十万人在这里安营扎寨，把党中央办公重地围个水泄不通；口号声、呼喊声、歌声与锣鼓声日夜喧嚣闹腾。

西花厅的位置紧挨着中南海西北角围墙内，周恩来一天劳碌了十多个小时，眼看天亮前正要进卧室去休息，也该是造反派们掀起白天上午的第一个高潮，就是叫你周恩来没法睡觉；或许这也是“中央文革”整周公的一种手段吧？

第四节

随第一位保健对象董必武视察湖北，
轮船航行在长江三峡，半夜三更董老

关心世界乒乓球比赛；陪同胡志明上黄山，发现山脚下躺着一只豹

我进中南海服务的第一个保健对象是共产党的元老董必武。实在是太幸运了，尽管在董老身边的时间不长，但留在我记忆中的印象至今仍十分清晰。

这位老人家才高八斗，是属于学者型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品德高尚，性情温和，脾气极好。而且他的夫人及子女等亲属都能平等待人，使我在他家愉快和顺利地工作了一年，让我看到了一位真正的共产党人、老革命家。

解放前，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重庆和南京等地同周恩来长期合作共事。

1949年，他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副总理协助周恩来工作，后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他俩有着极其深厚的革命情谊。董老为新中国的国民经济、政权建设和法制建设作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董老家的一年，对我后来在保健工作岗位上没有出什么大错，比较顺利地度过了这几十年，应该说有一定的关系。

董必武居住在怀仁堂东侧的一所四合院里。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自南往北一顺儿共有四个建筑格局相仿的院子。一号院住的是李富春与蔡畅家，二号院为谭震林家；三号院是邓小平家；陈毅一家居住在最后的四号院。周恩来与邓颖超居住在那长夜灯火不灭的西花厅，因而是我一生难以忘怀的地方。

随董必武视察湖北，使我第一次开了眼界。看到中央领导人是如何接触群众、观察事物、分析问题、作出结论，以及如何指导当地干部解决问题的方法。

同时，使自己养成长期随首长出差在外地生活，既做好本职工作，又要抓紧点滴时间学习。以至到了80年代末，我仍是一年之中有半年以上随首长生活在外地，直到离休为止。

1965年三月下旬的一个深夜里。

“咚、咚、咚！”忽然，有人急促地敲我家房门（当时住东交民巷北京医院宿舍）。

“张大夫在家吗？快起床，到办公室去，叫你出差去。”来人低声说道。

“知道了，你先走，我马上就去。”我听到是医院总值班室一个护士的声音，我答道。

我急忙穿衣起床，洗漱后赶到了总值班室。

“你赶快准备一下衣服和生活用品，带上出诊包，去南方出一趟差，中南海警卫局的老滕会与你联系，他与你一起走。”值班同事这样说。大概出于保密原因，传达任务的人只是说“去南方”，没有讲具体到什么地方。我不便多问，立刻回家准备东西。我刚走到宿舍门口，走廊里的公用电话铃声响了。

“你是张佐良大夫吗？”我拿起电话机，听到一个操着浓重山东口音的人在问。

“我是。”

“我姓滕，是警卫局的。我们一起出差去。我正在联系飞机票。看来，这深更半夜的飞机票不好买，要是买不到机票，我们只好坐火车走了。你就在家等消息吧。”他说完便挂断了电话。

这位姓滕的山东人在电话里仍未说要去的具体地方。我想不管他去东南还是西南，终归是南方。

时值严冬季节，除了两广和福建之外，都不会暖和，只有多带一些衣服保险。妻子起床帮我找出一只旅行袋，那时的行李简单，除了带几件换洗衣服、肥皂毛巾、牙刷牙膏和几本书之外，连袖珍收音机都没有。岳母也忙着起床煮了水扑鸡蛋给我吃。四岁的儿子睡得正酣。家里人懂得保密规矩，没有人问我去哪里，去多久和干什么事情之类问题。我收拾好行李，吃完东西，在房间里坐等消息。不一会儿，走廊上的电话铃声再次响起。

“张大夫吗？”

“我是张佐良。”

“今晚搞不到飞机票，明天也没有把握，上面要求我们尽快赶去，我怕误了事，只好买了两张火车票，我现在就来接你。十分钟后，你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门口等我。你要多带几件衣服，听说那边也不暖和。”从这个山东人说话的情形可知他对北京医院这一带地方非常熟悉。估计他经常出差，知道各地季节气候和衣服穿戴情况。不过，他在电话里仍说的是“那边”两个字。如此看来，负责保卫党中央领导人安全的警卫局，也就是公安部九局工作人员的警惕性之高，保密纪律之严，我甚是佩服。我辞别家人，拎起行李下楼朝胡同口走去。来到东交民巷派出所门口、夜深人静，路上车辆稀少，从中南海到北京医院宿舍只需几分钟汽车路程。只片刻工夫，我看到由西往东疾驶而来一辆小轿车，车到跟前，见是一辆苏制伏尔加，前面挂着白色牌照。汽车停住后，走下来一个瘦高个儿。

“你是张大夫吧？咱们快上车走吧。”来人说话口音及语气同电话里听到的一模一样，没有错，是警卫局的老滕。我们上车后，汽车向北京车站急驶而去。汽车将我们直接送到车站站台，只见列车员站在车厢旁，旅客都已上了车。我跟在老滕身后赶紧上了那节硬席车厢，车厢里已挤满了人。列车员帮忙引我们找到了座位，三个人的座位坐了四五个人，旁边还站着人，脚跟前还堆放着行李，待我们坐下后，连腿都伸不直。

“今天买不到飞机票，这是去成都最早最快的一次列车，费了不少劲才买到两张票。领导上要求咱们尽快赶到董老那边去，详细的情况到那边就清楚了。”他轻轻地跟我既介绍情况又解释着。

从老滕口中得知，我们要到董老那儿去。“董必武”这个名字令我肃然起敬。董老在我心目中早就是德高望重的老一代革命家。我同老滕初次相识，不便从他那里打听太多事情，再说，在火车上说话也不方便。所以，只好他说什么，我听就是了。

我们从北京经郑州，沿陇海路往西经宝成铁路蒙头转向地坐了一天几夜硬席车厢。这是我大学毕业从上海到北京乘火车长途旅行以来，平生第一次乘这么长距离的火车。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宝成铁路沿线通过无数的隧道，且每一个隧道都比较长，火车在洞里发出轰轰隆隆巨大的声响，真有震耳欲聋的感觉。由此想到，在我们国家还不富裕的情况下，要修筑一条长距离的铁路，特别是在地形条件复杂的地区施工，使交通发达，物流其畅，不仅投资可观，而且人力、物力与财力消耗巨大，是何等的不容易。

车厢里人多，拥挤得好比香炉里插满了香，烧到最后剩下的香头东倒西歪，加之列车行进中的颠簸，人们随惯性摇晃前进，但没有一个人因站不稳而跌倒。车厢内十分拥挤，活动很不方便，我除了吃饭，不敢多喝水，以此减少去洗手间的次数。有时即使憋得难受，也只好硬坐着不愿动窝。车厢里人多，行李多，空气太糟糕，什么味儿都有，令人难闻憋闷。由于久坐不动、下肢血液回流不好，使两条腿肿得厉害，由脚脖子肿到近膝关节处；双腿发麻、发木，犹如失去知觉一般。

我们就这样晕晕乎乎，摇摇晃晃，好不容易熬到了成都车站下了车。

“首长他们已经到重庆去了，你们赶快乘火车去重庆。我们已同那里联系好，他们有人到车站接你们。”四川省交际处派来车站接我们的人这样说。

于是，我们又乘上了开往重庆的列车。火车开动时已近傍晚时刻，虽说仍是硬座，身体已十分疲劳困乏，但这次列车车厢里旅客少，乘客都有座

位，感到轻松了许多。

我因旅途劳顿，睡眠不足，吃饭没有胃口。我们去餐车上胡乱地吃了点东西，记不清吃了些什么，但有一点令我至今印象深刻，那就是四川菜不仅辣还有麻。我素有结肠过敏，这一顿饭，食后“两头”不好受，令我以后不敢“恭维”。餐后回到座位休息，可以伸直腿，闭目养神，如四川人常说的“安逸”了。

第二天上午列车到达重庆车站，市委接待处来人将我们接到潘家坪招待所住下。3月份，北京的天气乍暖还寒，重庆的春意亦不浓。人说“雾重庆”倒不假，刚到重庆见不到太阳，老天不开眼，阴沉着脸，不时地飘着靠靠细雨。汽车进入潘家坪招待所，只见一栋栋青砖灰瓦、朴素大方、小巧玲珑的别墅式小楼分布得错落有致，别具一格。院子里树木花草郁郁葱葱，散发出芬芳，沁人心脾，比满天风沙的北京要好得多了，令人感到快意。

“接待人员安排我们紧挨董必武居住的那栋别墅旁住下；为安全起见，他们已将两栋房子间的走廊门锁上，有便衣巡逻哨。楼宇间以花坛、曲径和低矮的栅栏相隔。我和老滕住在同一间带卫生设备的宽敞房间里。

南方气候潮湿，客房内墙壁和地板都用木质材料装饰。室内陈设简单实用，两张单人床、一张办公桌、两把木椅子、两只小沙发与一只茶几。房间里有一股木质家具或油漆挥发产生的特别气味，但不算难闻。那时候，电视机还没有普及，房间里连收音机都没有，但那个时候，恐怕也算是“三星级”宾馆了。

我将自己的吃饭家伙，旅途中一直不离身的出诊包与旅行袋里的衣服及生活用品等取出安放好之后，坐到沙发里小憩。茶几上有服务员特为我们泡好的清香绿茶，我边吸烟。边品茗，边思忖着午饭后去看我的老同事、朱德委员长的保健医生顾英奇（后任卫生部副部长，现任全国红十字会副会长）。我听说，是他向领导出主意要我来重庆到董老身边工作的。

这是我第一次出差到外地，到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我还不了解情况，不懂得规矩，我的同屋老滕虽是一起来的，他未必了解当时的详细情况。我没有，也不便向他询问朱德委员长住在哪一栋楼？也不敢到院子里四处乱跑和瞎打听。

“嘭、嘭、嘭，”随着一阵敲门声，我听见有人在叫我，“张大夫在吗？”我听出那人的声音正是顾英奇。

“请进。”我说着，走到房门口去迎他，我们一起坐到沙发上。

他向我简要介绍了一点情况：朱德、陈毅、贺龙与聂荣臻等几位老师还有柯庆施等领导同志在成都相聚，柯庆施在成都骤发急性坏死性胰腺炎，经大力抢救无效而死亡。柯庆施死后不久，朱老总与几位老师便离开成都来到重庆。在成都和来这里，他兼顾着董老的保健工作。过几天后，老师们都要离开重庆，老顾要跟朱老总走。按照国家卫生部规定，董老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党的监察委员会书记，他离京到外地视察工作或休养都应带保健医生与护士。此次外出，他没有带保健人员随行，董老已是八十高龄的人了，患有痛风和三叉神经痛等疾病，发作时很厉害，需要有人在他身边照顾，所以让我来董老身边工作。

老顾约我下午一起去见董老，他将董老的病历资料交给我后，即告辞了。

中午，我与老滕跟董老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起吃午饭。董老外出轻装简

从，除他的夫人、老红军何莲芝以外，有一个警卫科长老丁、小曹和小梁两名公务员，这时又增加了我和老滕。

从前，听到过不少有关董必武的传奇与美谈。人说董老是前清时期最后的一个乡秀才，辛亥革命老人，早年参加同盟会，留学日本期间结识孙中山，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后来参加发起组织共产主义小组，成为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是党的一大代表。董老曾赴苏联学习并参加党在莫斯科召开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他从苏联回国后到江西苏区工作，后参加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董必武曾长期同周恩来等人一起在国民党统治区的武汉、重庆、南京等地领导党的公开及秘密工作。他曾参加旧金山联合国会议……

总之，有关董老的革命生涯、传奇、美谈和他对中国革命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实在是太多了。早在 40 年代，周恩来曾代表中央亲笔起草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贺董老六十大寿电中写道：“董必武同志：庆贺您的六十大寿！您过去的革命奋斗，贯穿了辛亥、五四、北伐、内战一直到抗战的各个历史阶段，为着中华民族的解放写下了光荣的史迹。您是中国共产党创始者之一……”

这一天老天爷算是给了脸。据说重庆已接连几天绵绵阴雨，这天下午太阳总算从云隙间露了出来，带来暖暖春意。我在顾英奇陪同下，心中怀着十二分的敬意去见董老。到达董老住地，夫人何莲芝大姐已等候在门口。一眼看去便知她是出身劳动人民、参加过长征的红军老干部。她已值花甲之年，几丝银发修剪得与普通女兵那样短而整齐，步履矫健，衣着朴素，笑容满面地向我们迎来。

“你是张大夫吧？我听顾大夫说了。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客气，以后我们就是自家人了。”她握着我的手，操一口浓重的四川乡音亲切地说。

我在董老处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听何莲芝大姐谈起她与朱德夫人康克清大姐的数十年友谊：长征途中经常遇到敌人的围追堵截，行军战斗，缺少粮草，人困马乏，历经艰险到达陕北延安。董老夫人与总司令夫人康克清都参加种粮种菜及养猪养鸡等延安大生产运动，她们同延安军民共同度过了艰难的岁月。进城不久，她们都住在中南海，始终过着简朴的生活，她们过从甚密，保持着深厚的革命友谊。

何莲芝给我的第一个印象是和善亲切，没有架子，平易近人、朴实热情，令我对她深怀敬意，也消除了我日后在他们身边工作的顾虑。我急忙自报家门，她把我们引进客厅落座，服务员端来茶水。何大姐走到我跟前，亲手将中华牌香烟及火柴递给我，询问我家庭、爱人工作单位及孩子等情况。片刻后，董老从办公室，不，应该说是从书房向客厅健步走来。

八十高龄的董必武鹤发童颜，他那堪称美髯公的胡须令人乍一看，真有“仙风道骨”之感，确切他说是学者风范。事实也如此，董老学识渊博，多才多艺，他能阅读英、俄两种文本马列著作原版书。他不仅诗词著名，他的书法亦堪称一大家。

大家见董老走来，立刻站起身来向他迎上去。我是新来的，自然主动抢走几步过去同老人家握手，顺便作了自我介绍。

“天气不错，到外面去走走。”他没有客套，随便地同大家打招呼，说罢即转身向门外走去。

大家跟在董老身后漫步。老人家说话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底气很足。

他为了革命，青年时期即走南闯北，东渡日本，到过苏联和美国，但依旧是一口浓浓的湖北黄安（今红安）乡音。那时期，我接触过的首长大多是四川、湖南、湖北人，我在上海读书时曾有幸听过陈毅市长作报告；在北京医院多次听过陈毅和粟裕的形势报告。但那时候，我仍分辨不出四川同两湖地区人的口音有何差别。我常以为“大人物”都出身在这几个地方。我跟董老初次见面留下的印象是：德高望重，再加上慈祥可亲。

日后几天晴朗的日子里，陪董老在院子里散步，我有幸多次在近距离内见到在中国革命史上驰骋疆场数十载、立下赫赫战功、威震四海的朱德、贺龙与聂荣臻元帅。那时候，这几位共和国功臣虽已进入老年，但看上去一个个身板骨硬朗，仍是威武英姿，一派将帅风度。

我见到朱老总和聂帅手拄拐杖，不过，拐杖并非他们年迈力衰的需要，只不过是一种风度。贺老总的烟斗不离手，但只是偶尔吸两口。首长们聚在一起谈笑，随员们则退向一旁闲聊。我认识的医护人员只有老顾。

若干天后，听说老帅们都已陆续离开重庆，只留下董老一家仍住原地。老人家每天读书、看报纸、文件和写毛笔字。不记得他有过外出活动，顶多在院子里散步。尽管重庆常常烟雨蒙蒙，但毕竟进入春夏之交，气候渐渐转暖，院子里花草更加繁茂，蜜蜂嗡嗡、彩蝶纷飞。我们都脱去冬衣改穿春夏季服装。董老仍穿着薄丝绵袄与厚袜子，还是岁月不饶人啊！

这期间，董老和夫人觉得身边人员不多，总共八个人正好开一桌饭。她常邀工作人员同桌进餐，这样可以节约，还可热热闹闹增加气氛。何大姐告诉我，在一起吃饭不要客气。你吃得多，把盘子吃它个光光的底朝天，董老才高兴，他就怕浪费粮食。何大姐这样说后，开始时我仍感到拘束，放不开，但很快也就狼吞虎咽了。

董老在北大中文系读书的女儿因体检发现转氨酶稍为高了点，怀疑她得了肝炎，学校让她回家休养，她便来重庆看望年迈的父母亲。她看上去就是五六十年代见到的普普通通的大学生模样、中等个头，身材匀称，皮肤白皙，衣着朴素，一双黑布鞋，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没有一点高干子女的味道，跟大家很随和，没有几天我们便很熟悉了。

在重庆期间，当地派人组织大家去参观红岩村、曾家岩 50 号、白公馆、渣滓洞等地，接受爱国主义和革命传统教育，也去琵琶山、大会堂和北碚等地观光游览。

4 月下旬，董老考虑要去湖北视察工作，准备乘轮船经长江三峡到武汉。据警卫部门介绍，途中除到万县稍事停留，但不靠岸外，其他地方都不停留。

我考虑到二十多小时路程，走的是水路，前不靠村后不着店，不能随处靠码头上岸。老人家毕竟八十高龄，体弱多病，万一途中发生健康问题，自己一个人承担不起这个责任。故出发前，我请重庆市委派一位心脏内科专家与一名护士随我们同行到武汉。

在一个天空晴朗的上午，我们在重庆朝天门码头登上一艘高级游轮，顺水而下。这是我第一次游三峡，一路上三峡的风光真迷人。只见两岸山峰秀拔，林木苍翠，船上负责导游的人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峰那个景，朝我耳朵里灌进一大堆，可我没记住几个。那时大家都还穷，没有人自己带照相机将这些美丽的风景照下来。二十多年后，我又多次去过三峡，补上了这一缺憾。

在游轮上，白天，董老坐在视野开阔的客厅里观赏两岸景色。随员们轮流爬到船顶上去赏景过瘾。夜间，岸上一片漆黑，山岚瘴气弥漫、或细雨

蒙蒙，既看不清挺拔的山峰，亦见不到洞穴。大家聚在客厅里，工作人员同何莲芝打扑克牌，董老坐在何大姐身后观战，偶尔他也出些点子。

大约到了深夜 11 点钟，董必武忽然站起身来说，今天是乒乓球决赛，你们打开收音机听一下结果。原来，我国运动员正在南斯拉夫罗布爾雅那参加第 28 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这天夜里，大约在我国午夜 11 点多钟将决出冠亚军。由于轮船铁甲对无线电的屏蔽作用，船舱里无线电信号太弱听不清楚，于是我和公务员小曹拿着董老的袖珍型半导体短波收音机到游轮甲板上去听。

游轮正向东开，由于船头风声和涛声等噪声干扰听不清广播声，我们只得跑到船尾去。

尽管是初夏季节，船在顺风顺水而下，但午夜里船舱外还是相当冷的。我们都裹着棉大衣蹲下身子躲避冷风，把收音机音量调到最高处细听。我们听到我国乒乓健儿获得团体冠军，同时庄则栋获男子单打冠军，林慧卿获女子单打冠军，加上男子双打、女子双打及混合双打，我国共获五项冠军。我们一听完广播结果，立刻奔跑到客厅将这个喜讯向董老作了“详细”报告。老人家听后高兴得用手捋着胡须连连他说：“好，好啊，我们最后胜利了。”他说罢便去睡觉了。

游轮乘风破浪不停地往东开。第二天中午到达武汉，登岸前，董老向船上工作人员及重庆派来的内科主任与护士表示了感谢。湖北省省长张体学亲到，码头来迎接。我们驱车到武昌，住进了东湖招待所（现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

董必武外出视察工作，他不愿让地方上领导人迎来送往、兴师动众的给他们添麻烦；他更不许搞接风宴请招待等铺张浪费的事情。到住地稍事歇息后，便自己一家人吃饭后休息。

自重庆至武汉期间，董老吃饭香，睡眠好，没有任何失健征象。不过，我不敢马虎，还是按照老规矩办事，为他测量血压和做心电图等检查，并请了湖北医学院附属医院著名心脏内科专家赵华月教授到东湖宾馆来会诊。另外，我想借此机会让专家与董老见见面，相互认识一下。让她熟悉董老的健康状况，以便日后董老到湖北农村去视察工作时请她同行，以保障老人家的健康。

董老到达武汉后，每天的“功课”依旧是读书、看报、批阅文件和写毛笔字——这也可算是董老的一种“养生之道”吧。我见过几次湖北省省长张体学到东湖百花一号楼来看望董老，未见其他省委领导同志到住地来过。董老感到自己年龄大了，所做工作有限，省委领导同志都很忙，自己在此休息，尽量不要麻烦他们，张体学大概算是省委的代表，也许是董老特许的吧。张体学省长一点没有官架子，他穿一身中山装、不讲究修饰，就像一个乡村干部，说话大嗓门，办起事来说干就干雷厉风行，叫你觉得他完全是一派军人作风。

我随董老住东湖招待所期间，老人家时常问我：“你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在做什么事情啊？”

“读书。”

“读什么好书？”慈祥的老人关心地问。

“我看英文心脏病学杂志，医学发展很快，若是不看新的医学进展，不了解世界上医学的发展，会掉队的。”

“好，年轻人能抓紧时间学习，这很好。我的身体还可以，平时没有多少事，你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学习，只有学习能使人进步；我也在学习呢。”

“我见您在看马列主义英文原版书，但字太小，能看清楚吗？”我见到他的案头放着这类书，才这样说。

“反正慢慢地看，有时用一下放大镜。你的英文不错嘛，能看懂原版书？”

“我在大学时学的是俄文，毕业工作后俄语已不太实用了，俄文书籍又少。英文是后来自学的，现在还是要查辞典。”

“抓紧时间学习好，但要注意身体，年轻人也要到外面走走看看活动活动，你到武汉来过吗？”

“这是我第一次来武汉。”

“我很想到外面去看看，现在年纪大了，很不方便，去不了。我一动，就要出动汽车，一大帮人跟着我。我到哪里去也不自由，给人家添麻烦，有时被一大群人围着看，走都走不了。我们在沙市的情形，你不是也看到了嘛。”老人家不无感叹地说。

“其实，你可以坐汽车到外面转转，车速慢一些，浏览一下武汉的街景和发展。”

“算了，我不想坐汽车到街上去兜风。你可以骑自行车过长江大桥到汉阳去看看，那里过去也很繁华热闹。叫他们（工作人员）给你带路，你看完了回来跟我说说见闻。”

“我今天下午就骑车去。”其实，我也想到外面去看看，只因首长不外出，我独自一人到外面去瞎逛，怕人非议、影响不好，现在老人家发了话，我还能放弃这难得的机会吗？

那时，武汉长江大桥是全国唯一的一座宏伟壮观的长江大桥，我当然很愿意去观赏一下值得中国人民骄傲的长江大桥。此后，只要董老健康状况良好，风和日丽，我连续好几天，吃完午饭出发，请董老的公务员或宾馆服务人员领路，一同骑自行车观光游览，偶尔，何莲芝同志外出访客，我就搭乘她的汽车逛大街，逛了回来，就找时间向董老汇报见闻忌是啊，当大人物也不容易，行动不自由，你想外出逛逛，散散心。可是，保卫部门要对你的安全负责任，否则，要是真的出了事，他们岂非吃不了兜着走。

董必武在湖北农村呆了一周多时间，可说是晓行夜宿到各地视察工作。有时为了赶路连中午也不休息，那时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公路状况大多不佳，颠簸劳顿可想而知，耄耋老人精神感人。他主要关心农田水利建设、植树造林和农业中学教育三件造福子孙万代的大事。他看了渣沱水库、四湖排灌工程、荆江分洪工程等。他找地方干部谈话或是开会讲话，都反复强调“十年树木，百年树人”的道理。他还特别提倡江河堤岸、水渠、公路铁路两旁、房前宅后等处空地都要种上树。在讲到推广群众植树时，他指出必须解决林权问题和育苗问题，调动起广大群众对植树的积极性。农田水利灌溉工程，既防治了洪涝旱等灾害，又可保障农业丰收，绿化和美化自然环境。他认为要让大家认识到这些工作的意义及重要性，群众才会自觉地去。董老说的这三件事，仍是我们现代农业的根本所在，如今看来老一代革命家的目光是多么的远大。

1965年5月中旬，董老自湖北视察工作返回北京后没有几天时间，中央请他老人家陪同越南民主共和国主席胡志明到我国各地参观访问。

1965年5月19日是胡志明七十五岁寿辰。胡伯伯是中国人民最亲密的

战友和老朋友。

他与毛泽东、周恩来及董必武等我国领导人十分熟悉，亲密无间。他到中国来就像走亲戚一样，所以他选择到中国来“避寿”。胡志明身边只有他的贴身警卫，服务人员是广东派的，北京医院选派一位高年资医生跟随，照料他的健康。

董必武陪同胡志明游览了济南名胜古迹，去了孔子的家乡曲阜，又到安徽芜湖，后到黄山住了二十来天。

庞大的车队开往黄山的途中，发生了一件有惊无险的趣事。那天，我们在芜湖铁山宾馆吃完午饭后，稍事休息便乘车赶路去黄山。将近掌灯时分，车队进入黄山境界。浩浩荡荡的汽车长龙一路上轰轰隆隆的马达声响，使临近黄昏时下山来觅食的虎豹等猛兽受到了不小的惊吓。领导人的小轿车在先导车引导下顺利通过。我与当地的警卫人员同乘一辆车“断后”。在离住地约莫还有二十分钟路程处，坐在前排位置上的省公安厅警卫处的一个同志发现了“情况”。

“前面有老虎！”那人突然大声喊了起来。

司机反应极快，随着喊声，他立刻紧急煞车，关紧车门、摇上车窗玻璃。汽车在山脚下很窄的公路上停住了。大伙儿直起身子，屏息静气，探头朝前看。只见二十来米处的地上躺着一只“大虫”！是老虎？狮子？豹？看不清楚。没有人敢于下车去“探险”。

“不管它是死的还是活的，先打它两枪再说。”这时有人提议，前排座位上有一人附议。他马上摇下车窗玻璃，掏出手枪朝那家伙“砰、砰”地开了两枪。枪响后，既不见那“大虫”抽动，也未见它跳起身来逃跑，不知何故，它仍一动不动地躺在那里。因离它较远，天色已黑，看不清楚地上是否有血。它死了吗？不知道。

我们急于赶路，不能在那儿耽搁过久，必须跟上前面的车队。又稍等了一会儿，有人建议汽车再往前开，离它近一点，司机按了几下汽车喇叭，它还是不动。此时，有人握着手枪，子弹顶上了膛，走下汽车，就近捡起石头朝它身上砸了几下，像是死家伙。他从后备箱里取出汽车摇把，走过去捅了它两下，证实确是死的。大家都下车去看，见是一只死豹子，地上流着一摊血。有人分析：这是一只过路的豹，此处是陡坡，公路下边是悬崖；它受了车队的惊吓往陡坡上跳，结果摔了下来晕了过去，这时恰好遇上我们，便挨了枪子儿，被打死了。大伙儿同意讲话人的见解，然后，几个人七手八脚将它抬着放进了汽车后备箱里继续赶路。

汽车到达黄山，我方得知董老住在观瀑楼，胡志明住在桥下面山麓，溪水边的温泉宾馆。我们将那只死豹子送进了厨房。

我疾步走向观瀑楼，进门便到董老房间去，在两位老人跟前将我在路途中“遇险”经过，绘声绘色地叙述了一番。他们听得蛮入神，感到有趣。

第二天中午，董老嘱咐我到厨房去看看厨师处理豹子的情形。我到厨房一打听，才知道昨天拉回来的是一只正怀孕的母豹，厨师剥掉豹皮后即开膛破肚，剖开母豹子宫，看见那只已死的小豹浑身具有花纹。

我回去向老人家复命，告诉他所见到的情形。他听后感到有趣地说：“从前以为豹纹是在出生后，生长发育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今天才知道是先天就有的。”

这天中午，我们工作人员餐桌上多了一道菜——红烧豹子肉！大家品

尝了这一特殊的野味，但觉得一点也不好吃。

当年，八十高龄的董必武依旧童心未泯，喜爱体育运动。他常常观看运动会的重大比赛项目。他还是个“乒乓球迷”。如前面提到，他由重庆去武汉，在游轮上，深更半夜的叫随员收听“世乒赛”的结果。

第五节

董老受冲击，小儿子两次无端遭逮捕；有人诬陷董老家中藏手枪；虎落平川被犬欺——小保姆封了副主席的“健身房”

1966年，“文革”动乱时，董必武已是耄耋老人。他除了出席重要的政治局会议、接受外国驻华使节递交国书等活动外，极少出头露面。他早已赋闲在家，以书法和诗词等自娱，过着含饴弄孙，极为平淡的百姓生活。但是，即便如此，江青一伙也不轻易放过他。

董老德高望重，为人厚道谦和，一生不争名利。按说，他没有跟谁结下什么冤仇。此时，他虽在党内外只是一些荣誉职务，并无实际权力可夺，但老人家威望高、影响大，这，仍使“四人帮”一伙人不放心。他们抓不到董老任何小辫子，一时无计可施，便采用了在精神上折磨老人家这一毒计。

1966年12月中旬的一个夜晚，董老的女儿突然接到在广州陪伴父亲休养的妈妈打来的长途电话说，爸爸刚接到中央通知要他的小儿子到公安部门去投案自首。没有人向他解释为什么，爸爸也没有问为什么。妈妈在电话中嘱咐女儿说：一定要听话，去吧。女儿尽管满腹狐疑，还是按爸爸妈妈电话中的嘱咐，老老实实地按中央指示去办。

第二天早上，她带着弟弟骑着自行车，也没有带洗换的衣服和牙具等生活用品，出了中南海西门，直奔北京革命历史博物馆东侧的公安部，在公安部熙熙攘攘的大门口，找不到接待他们的人。

“到市公安局那边去看看吧。”弟弟提议道。

“你们怎么也来了？”到了市公安局，一位舍在中南海呆过的警卫战士认出了他们，问道。

“中央叫我弟弟来投案。”

那人吃惊地看了她弟弟一眼，弟弟朝他肯定地点头。当公安局的人向他们了解到他们没有搬家，仍住在中南海，家里的电话机也没有撤掉，电话号码也未变，这都表明董必武没有被打倒，也没有受处分后，接待的人对她的弟弟要到公安局自首感到大惑不解。于是，她只得将妈妈打来长途电话的内容向他叙说了一遍。那人听后觉得拿不定主意，又找了一个年长些的人，把姐弟二人领进了屋子。

“谈问题吧！”那人说。

“我参加了由派出所提供线索，某军队提供了汽车、公安部派出人员保卫革命小将的打击流氓活动；参与了在‘中央文革’指点下的‘毛泽东“红卫兵”’抄砸民主党派办公室的行动……”

董老的小儿子边回忆边检讨自己从“文革”以来的“违法行为”。

“就这些？”市公安局的那人听后有些生气地问。

“就这些。”弟弟很坦然地回答。

“那么，谁让你们来的？”他感到奇怪地问。

董老的女儿只好将妈妈从外地打来长途电话的情形又复述了一遍。

“好吧，就这样。你们回去吧！”最后，公安局的这位同志明确地说道。

这一次，投案自首未成。

姐弟两人回家后立刻给老父母打电话，向他们详细禀告。母亲听后很高兴，但父亲又来电话催促弟弟去投案，女儿又对他说了经过情况。

“把投案的过程，报告总理值班室备案。”董老再次让秘书打长途电话给家里，郑重地嘱咐孩子们。

原来以为这天方夜谭式的故事，到此便结束了。哪里知道，1967年1月4日凌晨，北京市公安局打来电话，通知董老小儿子立即带上生活用品去投案报到！就这样，他的小儿子稀里糊涂地被关进了公安局。

关到这一年年底，江青、陈伯达、谢富治等人在人民大会堂召见了这一批专门从监狱里提出来的、曾经是“红卫兵”小将的年轻人，向他们进行了“教育”，实施了“宽大”政策，释放了这些可怜的小青年。其中，就有董必武的小儿子。他，只是一个中学生。事实上，这些年轻人恰恰就是曾经被江青他们利用过又加以迫害的那些人！可恶！可恨！可悲！

可叹！

董必武的小儿子一心想当兵，几经周折后，1968年4月初，广州军区同意接受。可是，令他们惊愕不已的事情再次发生了。

寒假期间，他们姐弟去广州与父母亲一起欢度春节，共享天伦之乐。节后，他们乘火车返回北京。列车抵达北京，进站停靠稳当，姐姐急匆匆地下了火车，很快进入了出站的人流之中。到车站来接站的哥哥和弟弟的女友突然看到事情有点不对头：他们见到弟弟被两个穿便衣的人夹在中间踉跄着往前走，弟弟向哥哥、姐姐和女友举起自己手上冰冷无情而沉重的手铐晃了一下。那两个人将他推揉着塞进了一辆预先停在车站的小轿车里开走了。

这一次，孩子们亲眼目睹了这严酷的一幕。大家眼睁睁地看着弟弟，不知他究竟“又犯了什么罪”而遭逮捕？

兄妹三人没有乘公共汽车，彼此一路无话，默默地从北京车站走向中南海的家。

为什么要抓我们的弟弟？！不清楚！古老文明的中华民族，这个泱泱大国，“法”在哪儿？

一直到了1968年10月上旬一天近黄昏时分，董必武那无端受铁窗之苦的小儿子又一次被释放。他拖着疲惫的身躯，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了家门。进屋后，他把监狱里用过的东西扔到房间角落里之后，走进父亲的办公室叫了一声“爸爸”，他的嗓子便噎住了，什么话也说不下去了……

“回来了？！坐吧。”老人听到儿子的声音，放下手中的文件，面带苦涩的笑容跟孩子说。可儿子憋在肚子里的话还是说不出来，他走过去坐在父亲身旁的沙发上。

父子二人相视了一会儿后，父亲问儿子为什么被抓进了公安局，又是如何被放出来的事情。

可是，这所发生的一切，正是儿子想从父亲这里弄个明白的。

至此，儿子才知道自己被逮捕后在监狱里关了半年时间，像父亲这样

党和国家高级领导干部都不知道此事的情由，真是无法想象，可见，江青一伙两次把他抓进去又放出来，这种卑劣的做法，确实是冲着父亲来的。

“他是代我受过啊！”正如父亲曾对姐姐说过的话。

为了不让老人伤感，孩子也就不再说什么了，有言尽在不言中，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就这样，他将一肚子的委屈憋在了自己心里，噙着眼泪站起身来默默地离开了父亲的办公室。

春末夏初的一天，董老从中央开完会一回到家，便神情紧张地把女儿叫进他的办公室（通常，孩子们是不进他办公室的）。

“是不是贺老总给过你一把手枪？”老人急切地问女儿。

那年月，正是鬼魅魍魉张狂的时代。董老的女儿亦深知自己的父亲正处在风口浪尖上。

她听老父亲一说“手枪”两个字，心里便一愣神，令她发懵，也发呆。此时，父亲怎么会提起手枪来呢？到底出了什么问题？！说起这件事情来可有年头了，她差不多早已忘记了。

50年代初，夏季的一个星期天，董必武大儿子约了叶剑英和其他家的几个孩子与妹妹一起去看望贺老总，贺老总愉快地接待了孩子们。那些男孩子纷纷向贺老总提出要鸟枪。贺老总戎马生涯，驰骋疆场大半生，最喜爱的就是枪。现在听到年轻人向他要枪，他身为国家体委主任，射击运动归他管，他感到年轻人喜欢枪，对射击运动是好事，也就满足了小伙子们的要求。

“给你什么呢？也是枪，好不好啊？”贺老总给男孩子们发了枪，他笑着看看董老的这个小女儿这么问。

“好、好、好！”女孩子高兴地回答说。

“去把那支小手枪给女娃娃拿来。”贺老总吩咐身边的人。

那人取来了一支小巧的手枪和四发子弹。这把枪就跟玩具一样，枪虽然锃亮，但棱角处的烤蓝已随岁月流逝而磨损了许多。女儿兴奋地把枪拿回家给妈妈看过后，便珍爱地收藏了起来。直到此刻，父亲向她提起手枪之事才想起来，向年迈的父亲如实禀告：董老听完女儿的这一番叙述后，精神很快松弛了下来。

原来，关于手枪的事已惊动了周总理。

一次开完会，总理留住董老问：“你女儿在北京吗？”

“在呀！”董老回答道。

“有人说，你女儿最近从叶向真（叶剑英女儿）那儿接受了一支小手枪，枪是贺龙的。

那人还说，贺龙借到怀仁堂开会的机会，到你女儿那里去拿枪，来暗杀主席！”周总理继续跟董老说。

董必武女儿听父亲这么一说，觉得那帮人实在是可笑又可恨。同时，她亦感到事情十分严重，难怪提到手枪之事便神色不安，他们欺人太甚，真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她心中不禁惶恐起来。她那傻乎乎的弟弟相信过标榜革命的“四人帮”，不久前刚遭囚禁。现在，看样子又有新的灾祸要降临到自己头上来了。谁叫你是董必武的女儿呢？！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这就叫做“人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啊！

后来，董老的女儿按照父亲的嘱咐，立刻和母亲一起翻箱倒柜地把心爱的、如今给她带来惊恐的小手枪找出来，交给了警卫局的一个男同志。那人拿起手枪看了又看，使劲地拉枪栓，就是拉不开，原来枪栓早就锈住了。

“这支枪根本没法用了。”警卫局的那个人说。

“你说没法用，人家说是有人要用它谋害毛主席呢！”

她交完了手枪，回家向老父亲复命，好让他老人家放心。

俗话说“虎落平川被犬欺”，还真是如此。好事轮不到一桩，祸害不断地降临到董老家。

“文革”前几年，董老喜爱乒乓球活动，大家为他在居住的宅旁清扫了一间汽车库，安放了一张乒乓球桌子，权当他的“健身房”。工作人员常陪他挥动球拍练几下，老人家借此锻炼身体。所以，他管乒乓球叫“卫生球”。

1966年，“文革”动乱那阵子，董老仅有的这一点爱好，即打乒乓球活动，也无端地被迫取消。

那间由旧汽车库改造的“健身房”，被红极一时的权势者陈伯达家的一个保姆，擅自叫人用木条把门钉死。从此，老人家只得放弃心爱的乒乓球活动。

董必武于1953年迁居中南海，为的是办公与开会都方便，可节约途中往返坐汽车的汽油和时间。1965年，我任董老保健医生时，他家住在中南海怀仁堂东侧一个四合院里。他家后院是王稼祥（时任中联部副部长），我亦兼管王稼祥的保健工作。

在经过上面这许多变故以后，董老决定搬出中南海，迁到六部口临近的一个院子里居住，直至老人家仙逝。

第六节

外国大使正等待向国家副主席呈递国书，董必武三叉神经痛猝然发作

董老患三叉神经痛已经有些年头了，疾病的部位主要在右侧，曾发作过多次，间隔期长短不一。我的前任保健医生向我交班时提到发病时的情形：病起突然，往往无任何预兆，发病时脸色苍白、右侧面颊、上颌与舌头都有针刺样或触电样的剧烈疼痛，不能说话，吃饭困难，连胡须也不能触摸，甚至手指还未碰到胡须，便感到触电样疼痛，面部肌肉抽动、眼泪与口水直流，痛苦难以忍受。往昔此病发作时，由卫生部保健局立即请天津医学院附属总医院神经外科主任著名脑外科专家赵以成教授来北京主治，北京市宣武医院脑外科王忠诚教授（现为中国工程院院士）协助，我曾亲历过董老两次三叉神经痛突然发作与两位专家治疗的经过情形。

1966年盛夏时节，正值“文革”运动刚刚开始，敏感的人们已经闻到了令人窒息的火药味。81岁高龄的董老平素性情温和、恬淡而寡言。本来说话不多的董老，如今音容笑貌少见，常常独自呆在办公室里静静地阅读，困惑？思索？恐怕兼而有之。

时隔不久，首都以至全国各高校首先组织“红卫兵”起来造反，大鸣大放、揭发大批判，霎时间大字报铺天盖地。他们很快冲向了社会，大搞打砸抢抓斗，其来势凶猛异常。清华、北大的许多著名教授被头戴高帽，身穿长袍。面孔画花脸，胸前挂大木牌，牌上书写“×××”大名再用红笔打叉

叉，糟蹋污辱其人格，使他们身心受到严重伤害。

我国负有盛名的人民文学家老舍先生，就是在这期间因不堪屈辱而投身太平湖以死抗命。

“红卫兵”受命的这些过火行动令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党的总书记邓小平深感不安、忧虑与不解。这几位中央领导人商定并征得常委们同意，向各单位派出了工作组，力图安抚党心、民心与安定社会秩序，使机关工作不受干扰，工业生产得以维持、百姓生活不受影响。本以为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完全正确的，但是，他们错了！于是，这三位高级领导人不得不在人民大会堂万人公众大会上，公开向广大群众承认自己对这一场骤然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认识不足，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所以犯了方向路线性质的错误！那么，谅必董必武他老人家亦是如此心情？他连最喜爱的“功课”——书法亦少动笔。

此时，从他的脸上再不见昔日随他去湖北视察工作期间经常看到的那种可以叫人感觉到轻松和愉悦的神情。

正在这时，董老的三叉神经痛又突然发作了。这是同他当时的心情有关？还是医学上所谓的“身心疾病”？

三叉神经痛发作已使董老疼得无法说话，不能触摸胡须……其痛苦情形近似上面所述。

虽不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仅仅是三叉神经下颌支发病，不算太严重，但不能说话，不能喝水，也吃不了东西。

“我立刻用电话同卫生部保健局联系，要求马上请天津赵以成教授来京为董老治病，但我很快被告知：联系不到赵教授，很可能他被“红卫兵”揪斗？”

那天下午，董老的工作既忙又重要。他要出席一个重要的会议，另外外交部已安排好两个国家新任驻华使节，到人民大会堂向国家副主席董必武递交国书，董老都不好推辞。

在情急之下，我已顾不得我们的老部长、保健工作祖师爷对保健医生的谆谆教诲：一个保健医生不要輕易地自作主张，独自给中央领导人做重要的诊疗措施，保健医生的职责就是“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他的教导是非常有道理的，在我日后的保健工作生涯中获益匪浅。但当时，董老三叉神经痛发作的痛苦形容不得我考虑那么多，那是“非常时刻”，并非我自不量力。作为一个医生的职责，我不能，且时间亦不允许等待，我别无选择的余地。再说，这一次三叉神经痛发作只是三叉神经的下颌支，治疗方法是最简单的一种，只需用麻药做局部封闭疗法即可奏效，我心里有数，认为是有把握的。若是整个右侧三叉神经痛发作，需作头颅上的卵圆孔穿刺封闭治疗，我是万万不敢造次的。

我当即向老人家“自告奋勇”地说：“天津赵教授恐怕一时来不了，况且我们也不能等待，您若是同意的话，我来给您作封闭治疗，肯定有效，不会有危险，顶多可能是效果差一点（我思忖着自己不要把话说得太满）”

“好嘛，你就给我打一针。”董老听了毛遂自荐解释后，爽快地接受了我为他作封闭疗法的建议。

自然，在一个不懂医的人看来，医生用一根细长的针头，抽上一针管麻药朝嘴里深深的扎进去，怪害怕的。但对医生来说并不是什么复杂的治疗方法。

我从出诊包里取出一根约六七厘米长消过毒的细针头，请董老张开嘴巴，在他右侧下颌骨处粘膜上用淡碘酒消毒后，将注射器针头刺入局部粘膜下直至下颌骨，再向外退出一点，用针芯试抽一下，见针管里没有回血，说明针尖不在血管里，针管里的麻药不会到全身去。

这时，我将针管内预先抽好的 2cc“利多卡因”麻药，缓慢地向几个方向注射进局部，注射完毕就拔出针头，站在一旁观察情况。

大约过了十多分钟，董老面部痛苦的表情顿时消失。他用手捋着自己的胡须不再疼痛，脸上终于露出了在这期间少有的笑容。

第七节

邓小平视察水陆两用坦克厂有惊无险；得知抓了坦克车驾驶员，邓小平让“马上放人”；成为“中央文革小组”重要成员的王力险些坠入万丈深渊

1965 年深秋，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率领副总理李富春、薄一波和铁道部长吕正操以及三线建设副总指挥程子华等人视察云、贵、川三线建设进展情况，卫生部保健局派我随行。

所谓三线建设就是国家为了战备而将重要的军工企业与重工业安排在云贵川三省。保健局交代我的任务主要是照顾好邓小平。

出发前，邓小平夫人卓琳同志引我见了邓小平，在为他作了简单的体格检查后，小平同志跟我交代说：“我这里没有多少事，不需要医生，但你可用我的名义跟出去，要把富春同志照顾好就是了。”

“好的。”我简单地回答。

那一次李富春夫人蔡畅大姐没有去，李富春身边随员比较少，一路上我多半随李富春一起活动。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之一，他在战争时期的赫赫功绩早被人们广为传颂。

邓小平青年时期赴法国勤工俭学时，同周恩来、李富春、蔡畅、蔡和森等人一起参加革命活动。留法期间，李富春、蔡畅把他当作“小弟弟”一般来照应，所以邓小平同李富春、蔡畅间的革命情谊之深非同一般，他，因此对我有这样的交代。

有人说，邓小平办事举重若轻，管大事，不经意小事，我不完全赞同。后来，我在同他的接触中碰到过几件不大也不小的事情，令我印象颇为深刻。

事情是这样的：在我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三线工作之前个把月，我按规矩，为了熟悉他的健康情况，多接触他，让他了解我，对我这个保健医生建立信心。因此我每星期至少要到他家去一两次。主要是卓琳同志和办公室的工作人员接待我，但他亦常看到我。按理说，他是能认识我的。可是，有一天上午，我拎着出诊包进了中南海怀仁堂西侧庆云堂胡同三号院邓小平家，他正专注地抱着一个不满一周岁的小孩子在院子里散步。

“卓琳，送文件的来了！”当他看见我拎着一只黑色出诊包便大声喊道。

邓小平一向耳背，故他说话的嗓音比较大，咳嗽清嗓子的声音也很响。看来，他一时未认出我，把我当成办公厅机要局送文件的同志了。

“喔，什么送文件的来了，是张大夫，请进来坐。”卓琳招呼着我。

1966年“文化大革命”一开始邓小平就被打倒，不久他被“遣送”南昌。在时隔七年后的1973年4月，那时他刚被“解放”，没有带随员，他只是同夫人卓琳一起看望因患癌症而作了手术正在玉泉山休养的周恩来。大家都高兴地到门口去迎接他们。

“你是张大夫，总理还好吧？”他跟我握手时这么说。

这一回，表明他是认识我的，尽管是件小事，况且时间隔了七八年之久。

我在保健工作中接触过多位中央高级领导人，当然时间短，知道得不多也不深。但从表面看，唯有邓小平、董必武和陈云等首长，家庭中三世同堂、儿孙绕膝、共享天伦。尤其是邓小平喜欢孩子也是有目共睹的，如他带着第三代到飞机场迎接外宾，参加植树节等重大活动使广大观众都在电视荧屏上看到了。他，与一般的老爷爷含饴弄孙没有什么不同。他，是伟人、是党和国家高级领导人，但他也同普通老百姓一样有着温馨的家庭生活。

去三线视察那会儿，李富春是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薄一波为政治局候补委员、副总理兼国家经委主任，邓小平带着主管国家工业和经济的重要负责人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可见此行的重要意义，此举简直可同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相媲美。当时的邓小平刚进入花甲之年，他精力充沛、同老战友相处在一起情绪特别高，常听到他侃侃而谈与琅琅笑声。

解放战争时期，我在部队里就听到过许多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的神奇故事。上级指派我跟随邓小平去云、贵、川视察工作，我感到十分荣幸。

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犹如他当年带着千军万马驰骋疆场一样，他任总前委书记，但他必须要有刘伯承司令员等几位能征惯战的将帅配合默契，方能度过重重难关，克敌制胜。

想当年，三线建设工程规模空前，在国家工业底子薄，经济尚不富裕，技术比较落后的情况下确实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举措。其时，咬着牙投入了大量资金、人力和物力，依靠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精神去创造奇迹！当时，我看到的攀枝花（即渡口市）钢铁联合重工业基地正待开发当中。邓小平此行，带着中央主管工业、经济建设和铁路运输的主要负责人同行，无疑要去完成一次大的战役，取得重大胜利。可惜的是他尚未等到战局的结果如何，“文革”动乱便开始了。

此次随邓小平去三线视察工作发生了一件虽说有惊无险却亦令人心悸的“意外事故”。

邓小平是四川人，他一到成都自然就是到了家乡，西南大区书记李井泉、四川省委书记廖志高和重庆市委书记任白戈等人都热情接待并随同总书记视察工作。

一天上午，根据日程安排，大家去参观水陆两用坦克车制造厂。原先安排在嘉陵江边观看水陆两用坦克车开到江里去表演，只因天公不作美，雨下个不停，道路泥泞，不得不将坦克表演临时改在室内进行。水陆两用坦克成了“一用”，暂且只好当作普通坦克车表演了。

大家未能看坦克车开进江里去的精彩表演，多少感到有点煞风景。

厂方负责人带领大家进了一间大厂房。真不愧是坦克工厂，厂房之大

使我生平第一次开了眼界。除了厂房中央划出了一块空地停着一辆预备表演的坦克车外，里边停满了坦克车。

参观人员被安排在这辆表演坦克的四周。

首长站在前边，随员在后。我站在邓小平右侧，同他相隔开七八个人。我的右边是铁道部办公厅主任，我们背靠停放在身后冷冰冰、硬梆梆的钢铁家伙——水陆两用坦克车。我们没有退路。

技术人员向首长们介绍了坦克的性能和同军事上先进国家坦克的比较情况后，便开始进行坦克车原地转动表演。一位负责现场指挥的同志手里举着一面小红旗站在坦克正前方，驾驶员在坦克车内通过一个外“八”字形的视窗按照指挥员的命令进行操作，那辆表演坦克启动时马达发出隆隆的轰鸣声，参观者被震得耳膜轻微疼痛，听不到旁边人们的说话声。

坦克车先作顺时针方向慢速转动一圈，中间灵活地表演了几次煞车，一切都很顺利；但它刚一停稳又突然启动进行逆时针方向高速转动，还没有令参观者反应过来，已有好几个人被掠倒在地。我摔倒在地，手里提着的出诊包被甩出数米远。紧挨我右边站着的铁道部办公厅主任也倒在我身旁。他用右手护着左胳膊，只见鲜血从他手指缝里滴下来，他的外衣已染红了。我急忙从地上站起来去检查他的伤口。他的左胳膊受了重伤：身上的军大衣、呢中山装、毛线衣、衬衫及棉毛衫等五层衣服被撕成一个大洞，伤口又大又深，骨头也露了出来，鲜血直往外流。

这位主任挺坚强，他只是用好胳膊托住受伤的左臂，紧皱着眉头低声地哼哼着。有人把出诊包给我递了过来，我取出急救包替他包扎好伤口，接待部门用汽车送他去医院。

首长们都已安全地离开了现场，我正欲拎起出诊包返回潘家坪住地时，突然感到自己右手腕剧烈疼痛，无法拎起出诊包。仔细一瞧，发现右手腕关节已肿了起来。在场的人也用汽车把我送到重庆医学院附属医院骨科门诊，经X光拍片检查发现桡骨下端裂了一条小缝，幸好并无错位。医生用中药敷贴局部并以石膏托固定右臂。我这点小伤同那位主任相比算不了什么，虽说有点痛还是可以忍受。但我不知道自己受伤后还能否继续随首长们一起活动。

“张大夫，疼得怎么样？我们这里事情不多，你可以回北京去治疗，养伤要紧，不要勉强。”回到潘家坪后，卓琳见到我便关切地说。

“……”

我听后就默不做声，不知道自己应当怎样表示好。

我受了一点伤，到底应该说“没有关系，可以留下来”，还是说“我回北京去吧，另找一位医生来接班”？这毕竟不是战争环境轻伤不下火线。

“当然，你愿意留下来继续随我们一起活动，我们是欢迎的。”她见我未表示态度，大概看出了我的心事，又接着补充了一句。

后来，邓小平办公室的人真诚地征求了我的意见，我表示愿意留下来随团活动。

第二天中午，我听到邓小平办公室工作人员说：地方上，在我们离开后就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抓了起来。

“马上放人，不许处分他！这件事情同驾驶员根本就没有关系。”邓小平向他的随员这样交代，并要他们赶快去办。

邓小平得知地方上抓了坦克驾驶员，他在仔细了解情况后有些生气地

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那个坦克车驾驶员坐在车里完全是听外面指挥员的命令动作。这个驾驶员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立过功，为什么要抓他？要说有责任的话，还是安排这个活动的领导要负责，组织工作没有搞好嘛。事情已经发生了也不要再去追究什么责任，重要的是应该吸取教训，这么搞法不好！

我听他们讲了这件事情的经过，内心非常感动，觉得邓小平真了不起，我既为那个驾驶员庆幸，感激邓小平，也为我们党有这样英明的领导人而欣慰。

若是碰上哪一个官僚主义的大官、昏官，这个驾驶员可就要倒霉了，即使不被枪毙也得叫你在大狱里呆上几年，起码得审查你的动机、政治背景或幕后指使者以及祖宗三代的历史。

“文革”中，邓小平作为我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我跟家人和挚友曾多次悄悄他讲过上面这个真实而感人的故事，一个大人物能如此体谅与宽容基层干部，关怀平民百姓实是难能可贵。由此不难看出邓小平决不是坏人，说他有错误我不敢反对，但要打倒他，我觉得太过分了。

邓小平率同李富春、薄一波、吕正操等人到三线视察把基础重工业的选址与布局敲定下来。这个中央视察组庞大的车队首尾相接排成一字长蛇阵，开道车与最末尾的后卫车拉开好远的一段距离。

我们由成都出发，经重庆、长江上游川南港口重镇宜宾市，直往贵州省府贵阳小住。然后去参观决定中国共产党命运的遵义会议会址。地方党政负责同志请长征时期任党中央秘书长的邓小平与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审定参加遵义会议的人数、与会者所坐的位置等问题，邓小平和李富春给予了明确而满意的答复。

嗣后，再继续往西进发直到西昌（今天的卫星工业城）南边的会理住了几天。会理地处四川云南交界处，属亚热带气候，到了那里人们都换穿夏季服装。会理招待所濒临“琼海”边上。说是“海”其实是个大湖泊。据说，很久以前西昌地区突然发生剧烈地壳变化，使这儿一座城市从地平线上消失，陷入深达百米的“海底”，随即形成了美丽的湖光山色这一自然景观，后人称之为“琼海”。

“琼海”的湖面宽阔，湖水清澈，水面平静如镜，蓝天白云及山岭树木倒立水中，映照出一幅美丽的风景画。遥望四周云雾萦绕、林木叠翠的群山包围着这幽静的“琼海”，实乃人间仙境。我们从天寒地冻的北国来到这“琼海”之滨，腊月天气的“海水”水温仍在摄氏 18 度左右，我们中勇敢的同行者跃入水中畅游一番，真是痛快，亦算是不虚此行。

翌日上午，我们从会理出发驱车赶往视察三线建设的最后一站春城昆明。云南省委安排邓小平同志等一行住进昆明饭店。

那一次，我有机会跟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工程之行，一路上山高路险，不少地段公路修筑在海拔两千米以上，仍属半山腰。公路路面很窄，常常一侧是陡坡，另一边为万丈悬崖。公路急弯甚多，但没有设护栏。当时尚没有现代化的高速公路，因是泥土路，故路面状况不甚平坦。几十辆汽车快速行驶途中，我盼前顾后看不到车队首尾。汽车长龙时而盘旋而上几乎接近“山顶”；由上往下看去，只见那一辆辆小轿车简直就像“甲壳虫”，车队顺着山坡蜿蜒而下直至谷底；抬头朝上看去，只见车队过处尘埃滚滚好似在云里雾里缓行。

为了要赶路，整个车队速度还是比较快，我们随着公路时常忽左忽右

地急拐弯，幸好司机驾车技术均属一流，否则性命交关。即便如此，乘车人中有好几位因急弯大多导致晕车，脸色蜡黄，额头出虚汗并有呕吐。

高原公路上白天万里无云，烈日当空，空气中湿度很低。尽管有些地段的路面用人工撒了点水，但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问题。车队过处依旧是尘土飞扬，不得不使汽车之间拉开较长的距离。使后面的车辆少吃尘土，亦减少撞车的危险。到了夜间，高原气候寒冷，路面会结冰。后来在“文革”中那个大红大紫的王力，就在那次旅途中翻了车，险些丢了命，幸好汽车卡在两棵大树间，算他命大，没有坠入万丈深渊中。

此次我看到了长征时红军不畏艰险，同敌人无数次浴血奋战、作出重大牺牲渡过天险而取得最后胜利的那几条著名江河：毛泽东长征诗词中有“金沙水拍云崖暖”之句的“金沙江”；毛泽东等人率部两次突破的“乌江天险”；1935年红军在四川中西部强渡的“大渡河”等。人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云、贵、川三省确是多山地区，虽不像大西北的黄土高原那样，处处荒山秃岭，一看便知是一副贫穷落后的面貌，但大西南也不是林木繁茂的花果山。四川略为富裕一些，历史上属于“粮仓”；而贵阳的干部告诉我，当地老百姓十分形象地说解放前的贵州地区是：“路无三里平，天无三日晴，腰无三分银。”在我去那里的时候差不多还是那种状况，没有什么改观。据说，改革开放后的现在，那里仍属需要脱贫致富的“老少边”地区。

尽管我有幸领略了一些大自然的山河之美，但更使我钦佩的是经历过后世永远传颂的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老一代革命家，这次随同首长视察三线，也领略了他们当初通过云、贵、川贫穷落后地区以及爬雪山过草地是什么样的滋味。

邓小平是中国共产党的元老，政治上经历过大起大落的考验。1973年他恢复工作后只用了近两年时间“治理整顿”，便使我国已濒临破产的国民经济有了好转。

周恩来胸怀坦荡，目光远大。他力举邓小平接替他的工作，深知“小平肚里百万兵”，邓公具有雄才大略，堪当重任。

1976年1月15日下午3时，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周恩来的追悼会上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为他的老战友周恩来宣读悼词。这也是邓小平再度遭受劫难而靠边站的开始。在此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不见他露面、不闻他的音信。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尽管当时上面对邓小平复出工作仍有非议，少数人且有阻难。但党内外、干部、群众、全国上下希望邓小平出来工作的呼声很高，因为邓小平在“文革”中作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被打倒，他的名字早就家喻户晓。“文革”后期，邓小平初次出山，他敏锐的政治眼光，力挽狂澜的勇气，大刀阔斧的工作作风，令人十分钦佩。老百姓呢称他“邓大人”决不是偶然的。群众同情他、信赖他，希望邓小平能再次出来工作、主持大局，中国才会有希望。

1976年清明节前后，天安门广场的“四五”事件就是人民悼念周总理、同“四人帮”抗争的明确态度。在那“史无前例”的年代，我不过是个微言轻的人，深怕自己挨整全家遭殃，更重要的是自己没有胆量公开对邓小平这样的人物评头论足；但是，我在同相信不会出卖自己的家人和挚友面前悄悄地议论邓小平的伟人气质，常举出邓小平在重庆为水陆两用坦克车驾驶员解脱的故事，和他1973年复出工作后的功绩告诉大家。

60 年代，我国政府出于战备考虑，将军工产业分布在内地大山沟里或山洞里，那些地方多半是交通与通讯困难、生活不便的地方，如当时正在建设中的工业重镇渡口市就有钢铁、煤炭与机械工业。参观途中，我们见到从沿海地区，特别是从上海抽调去的许多工程技术人员与熟练工人。那时党的威信高，人们的觉悟也很高，我有意同几个上海人交谈：“你们到这个山沟里来工作生活上有什么不习惯吗？”他（她）们朴实诚恳地笑答道：“有点不习惯，但这点困难是可以克服的，相信今后会慢慢好起来的。”解放后，沿海经济较发达地区响应党的号召支援边疆和帮助内地建设，不少工厂、企业、高等院校与科研机构内迁，大批知识分子和工人随之而去，他们在那里真正安家落户，为祖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第八节

急诊的对象竟是公安部长罗瑞卿，外伤？跳楼？他以死向林彪一伙示威

1965 年 12 月上旬，我随邓小平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到达昆明，拟稍事休息数日后返回北京。一天半夜光景，值班人员接到紧急电话通知，要邓小平第二天赶到上海出席紧急会议。

第二天一早，我们便忙着收拾行装准备打道回府。邓小平、李富春等同乘一架飞机飞往上海。到了上海同住锦江饭店南楼，随员们将各自的首长安排好之后已到了午饭时间。在餐厅里，我们见到先期到达的政治局委员身边工作人员，大家坐定后正在谈笑间，有人向我们宣布了随首长来此参加会议的全体工作人员应遵守的几条纪律：不准外出，不准同外面的人打电话，相互间不准议论，首长的文件自己保管……

按照上级指示，我们都老老实实呆在锦江饭店自己房间里待命。每天只有在就餐时间大家在餐厅碰面时才嘻嘻哈哈说笑一阵。

会议持续了个把星期，气氛相当紧张，首长们个个脸上不带笑容，一向少言寡语严肃的邓小平说话更少了。工作人员互相见面时，平常会说几句玩笑话的那种轻松一下的劲儿亦消失不见。待至会议结束的那天晚上，锦江饭店小礼堂举行了一个文艺晚会。礼堂布置典雅、灯火辉煌，我有幸在近距离内第一次见到周恩来、陈毅、叶剑英等领导人的风采。

到锦江饭店出席晚会的宾客们，服装与修饰大方得体。文艺界的女演员风姿绰约，她们还表演了精彩的节目。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两位唱评弹的女演员，她们修长的身材，穿着素雅的旗袍，怀中抱着琵琶，弹唱以毛泽东诗词《蝶恋花·答李淑一》和《七律两首·送瘟神》谱曲的弹词。那词好，曲美，唱腔美，情感丰富、悠扬悦耳的歌声不停地回荡空中，真是一次最好的精神享受。

演出中间安排了舞会，大家争着同领导人跳舞。一曲终了之后，周恩来已被许多人包围着，大家争相同他握手，他们就像许久未见面的老朋友那样毫无拘束地坐在他身旁欢快地交谈。每当舞曲响起，都争着同周恩来跳舞，

常常一支舞曲中间会有几个舞伴轮换着跟周恩来伴舞。

“我提议，请剑英给大家唱一曲评弹，好不好啊？！”忽然间，周恩来站起身来拍了几下巴掌叫大家静一静，并大声地这样说。大厅里立刻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我心里好生纳闷，叶帅是带兵打仗出身，况且他是广东（梅县）客家人，怎么会唱江浙地区特有的评弹呢？

“好吧，总理叫我唱我只好服从命令，我唱一首弹词开篇。”叶剑英听了周恩来的提议，加之场内的热烈掌声，就痛痛快快站了起来。

大家再次报以热烈的掌声。

这位不愧是多才多艺的老师居然能用标准浓重的苏州腔来演唱。叶帅的嗓音好，底气足，曲调准确。他字正腔圆、委婉动听地唱了一曲，全场听众喜出望外，再次热烈地鼓掌祝贺叶帅唱得好极了。这也使我开了眼界，饱了耳福。

以后我才知道，邓小平接到电话通知赶往上海，是出席毛泽东在上海亲自主持的中央会议。

林彪、叶群、吴法宪和李作鹏等人在会上向罗瑞卿发起攻击。他们无限上纲、无情批判、恶语相伤，其目的十分清楚，就是要整垮罗瑞卿、夺取解放军总参谋长这个极为重要的军队领导职位。

有关公安部长罗瑞卿遭迫害之事，乃发端于林彪让他的老婆叶群持林的亲笔信赴杭州秘密诬告罗瑞卿。

1965年10月，毛泽东住在杭州西子湖畔山明水秀的汪庄别墅。

“我这次来，是林彪叫我带来一封面交主席的信，请你带去交给主席吧！”叶群来到杭州见到了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同志时，她这样说。

“好。我交给主席。”张耀祠接过叶群给他的信件放进了自己衣袋里，叶群便告辞走了。

“我给林彪打了个电话，林彪说，信要我当面交给毛主席。”叶群只走开了一会儿，又返回来告诉张耀祠。

“好。你当面交。”张耀祠心中不悦，马上将信交还给她。

这时，张耀祠觉得叶群这个人变化无常，疑及她心中“肯定有鬼”。当张耀祠面见毛泽东时将叶群的情形报告了一番。毛主席听后“哦”了一声，没有讲别的什么。可是，第二天早上5点多，护士长通知张耀祠，要张立即打电话告诉叶群，主席要见她，叫她快点来。叶群在接到电话后很快赶到了汪庄。

“谈话不要超过两小时，主席还没有睡觉。”张耀祠见到叶群便这般提醒她。叶群到了毛主席那里谈话时间竟长达近五个小时。张耀祠出于关心毛泽东休息与健康，他先后进去三次提醒毛主席休息，自然也是催促叶群该早一点离开。他每次进去催他们结束谈话，主席都没有讲什么，也未见效。可见林彪信件内容之多，其重要性非同一般，不然，毛泽东不会有耐心听她絮絮叨叨地讲了那么久。

当谈话结束，叶群得意洋洋地走了出来，眼里充满了胜利的喜悦。虽然那时毛主席对叶群的这些话半信半疑，但主席对罗瑞卿的看法由此发生了改变。

1966年5月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有关方面负责人共七十多人。政治上已经失势的刘少奇主

持了会议。毛泽东仍在外地没有出席会议，但是会议的主要内容仍是按4月毛泽东在杭州主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决定的精神办的。

会议按照林彪和康生等人的指控，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和杨尚昆（“文革”中简称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错误”，毫无根据地将他们打成“反党集团”。会议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和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以后提请中央全会追认和决定。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宣部部长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这次会议决定调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任中央书记处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就此拉开了“文化大革命”的序幕。

5月16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那份著名的中共中央《五一六通知》，此《通知》为发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确定了指导方针。《五一六通知》在组织人事安排上也作了明确规定，提出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陈伯达任组长，康生当顾问，副组长有江青、王任重、刘志坚和张春桥。

5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他批判彭、罗、陆、杨等人的“反党罪行”。

他说这次会议的决定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颠覆的大事。”他在会上宣扬了“天才论”、“政变经”，鼓吹“有权就有一切”的谬论，还别有用心地神化毛泽东为“天才”，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后来人所共知的事实证明，搞反革命政变阴谋的正是林彪自己。

1966年初夏的一天近中午时刻，我刚好离开总值班室准备回家去吃午饭，走在北京医院院子里，碰见了我们的老护士长王如。她正急匆匆地往宿舍方向一路小跑过来找我，她一见到我的背影就喊道：“张大夫，等一等，别走了，我正找你呢！”我听出是她的声音，便停住了脚步，转过身去等着她。

“有急诊，您赶快出诊去！出诊包给您准备好了，急救车马上就开过来。”她快步走到我跟前，这样说。

“去哪儿出诊？什么病？内科还是外科？”我急切而轻声地问她。

“我也不知道。我刚接到电话通知，要我们马上出诊去抢救一个重病人。”看来她确是不知道具体情况。

我同护士长奔向总值班室，看见救护车已停在门口，二话没说便上了车。

“是公安部罗部长。”上了车，护士长悄声地告诉我。

可我仍然弄不明白。堂堂公安部长罗瑞卿大将有急病，用不着对我都这样神秘兮兮的，有必要如此保密吗？我到罗部长家里一看不就清楚了。

再说，一会儿抬着病人上救护车，瞒不过司机的眼睛呀；到了北京医院，病人躺在担架上叫人抬着通过走廊，进入电梯，再去病房……这能保得了密吗？！

正当我在思索与稍带点埋怨情绪之时，急救车开进了罗瑞卿家院子里，在他家那座不算高的二层小楼前停了下来。

我从车上走下来，第一眼就看到楼门前台阶下的水泥地上有一摊鲜血！我的妈呀！真的把我吓了一跳。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不用问，从现场情况一看便知，‘病人’是外伤！跳楼？公安部长跳楼？！不可思议！”

罗瑞卿居住的院子大门外站着哨兵，院子里边静悄悄的，看不到有人

走动，车子进门后，大门就关闭了。

我被人引进了罗瑞卿的卧室。房间的窗帘拉上，室内开着电灯，光线稍感昏暗。罗瑞卿仰卧在床，眉宇紧蹙，神色忧郁。

“你为什么不跟主席讲清楚啊？你不该做这样的傻事呀！”罗大将的夫人坐在床头，一边流泪，一边责怪和不安地嘟囔着。

“……”

片刻的沉默。

“你不要再说了，说什么都没有用！”罗瑞卿神情严肃地说了这么一句话之后，便缄默不语。

我见到这种情形，自知不便再多问什么“病情”。

从医学角度看，这样的病人容易造成脊柱损伤，若是脊柱骨折，易致脊髓损伤而使下肢瘫痪。所以，对这样的病人按理是不许可抱着或是背着移动他的身体，那样容易使脊柱弯曲导致脊髓损伤引起截瘫和大小便失禁等严重后果。且说，病人本应当睡硬板床，可他已经躺卧在软床上。但试想，谁家会有这种知识呢？

事已至此，我只得为罗部长作检查，并请护士长立刻打电话请外科、骨科及心脏内科专家一起来为病人作全面细致的检查，尽快将他安全地移送到医院去抢救。

我为罗瑞卿测量了血压、脉搏，做了心电图，用手电筒看了一下眼睛的瞳孔，都没有发现特殊情况，但未敢翻动他的身体。

北京医院的专家很快赶来现场，他们听取了我的简要病情报告，为罗大将作了必要的检查，并给他注射了一针止痛剂后，他们指挥着叫人平稳地将病人托扶上担架，抬上了急救车，由我们护送到北京医院。

尽管是中午时刻，医院领导非常重视。他们接到通知后，准备好了病房，放射科医生被叫来待命，并将北京著名的骨科专家都请到了医院。

我们按照专家们事先商量的意见，急救车直接开到医院放射科门口，将病人抬进去作调光摄片检查，摄片结束后，便送他进了手术室。

麻醉科医生立刻为罗瑞卿进行麻醉。专家们检查病人各受伤部位时，放射科主任将调光片送到手术室，大家根据病情与调光片结果确定了手术方案。

罗瑞卿在遭受林彪严重打击和残酷迫害后又无处申辩的情况下，终于出此下策，以死抗命！向林彪示威！

他在家中跳楼造成双侧多根肋骨骨折及双下肢跟骨粉碎性骨折，使这位驰骋疆场的著名将领日后落下了终身残疾。

当时，尽管周恩来对北京医院和解放军总医院一再嘱咐要对外保密，千方百计保护他，也无济于事。

在那疯狂的年月，凡林彪与“四人帮”直接插手的事情，医院是没有能力保护罗瑞卿的，也绝对保不了密。

所以，造反派很快便打听到罗瑞卿的“下落”，他们惨无人道地将罗瑞卿放在箩筐里抬到各处召开大会，对他进行批判、游斗和羞辱。这一幕幕惨景至今仍历历在目，令人心颤。

堂堂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战功赫赫的罗大将竟如此遭际，这不仅是他个人受冤受屈受辱，亦是国家受难、人民不幸。

令人惋惜的是，直至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罗瑞卿得到了平反，恢复了

名誉。他去德国治疗伤残时，心脏病突然发作，经抢救无效而不幸逝世，实令人痛心疾首。

第九节

这是文人间的笔墨官司吗？

1965 年 12 月，“上海会议”结束后，邓小平在上海小住数日后，即飞返北京。

我出差回京后，补了几天假，在家休息。每天翻阅当天的《北京日报》，发现重要版面上不断刊登以黑体字作标题，关于“海瑞”的大块文章，用的都是些刺人的大字眼，我只看标题未在意内容。我不搞历史，缺乏历史知识，对历史也无多大兴趣。我想一定是文人们在打笔墨官司，故未经意。可我的同事中有一位政治上比较敏感的“老保健”（老资格的保健医生），他见着我便说了话：“张大夫，你注意到最近报纸上的文章了吗？”

“什么文章？”我不解其意，反问道。

“哎，不就是‘海瑞罢官’嘛。”他用惊疑的眼光看着我。

“‘海瑞罢官’？‘海瑞’是什么人？文章里讲些什么东西？”

“你不是刚从上海回来吗？难道什么都没有听说？”

“……”

他见我木然不知，便转身走开了。

我在好心的“老保健”启发提醒之下，才回家去仔细地翻阅报纸上有关“海瑞罢官”的文章。

史学界的文章大手笔多，文章长、专业名词多，既难懂也不容易记住，对我这个可称之为“历史盲”的人来说，读来感到枯燥乏味，实在读不下去。

我看报纸的习惯是偏爱国际新闻，什么美国啦，苏联呀，因为是“两个超级大国争霸世界”嘛，当然要注意。这也可能同那时报纸上的文章可读性已经开始大为减少有关。所以，类似于我这样的人不大会去注意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姚文元其人，更不晓得他写的什么文章，这并不奇怪。

后来才知道，姚文元于 1965 年 11 月，写了一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首都的《人民日报》、《北京日报》和《解放军报》等大报都迟至 12 月中旬方才转载姚的文章。

说实在的，当时按本人的工薪尚舍不得订阅这类大报，我家只有一份《北京晚报》。我手头看的那份《北京日报》也是借邻居家的，在同事指点迷津之下，我去图书馆翻阅大报纸。

那时的大众传播媒体尚不发达，电视机不普及，故姚文元的文章发表后好长时间并未引起公众注意。像我这样也算是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仍旧政治意识淡薄，显得比较迟钝。

我在“老保健”提示下，用心去翻看大报纸上刊登的姚文元文章。但横看竖看，就是看不出姚文元的文章有何深刻意义，更看不出这篇文章有何重要背景。我不知道中国有几个人能从姚的文章中能看出点“苗头”来？

此后不久，姚文元的文章一炮打响，名声大噪，引起轰动！使本来是史学界专家学者间的学术争论问题慢慢演变为针对某些人的尖锐批判了，不是我辈所理解的那种文人间的笔墨官司。自然，姚文元亦随之大红大紫起来，爬到中央政治局委员、主管中央新闻部门的高位、权倾一时的“中央文革小组”的主要成员、再后来便是众所周知的事了……别以为在红墙里工作的人什么都会知道。

回顾自己，个人经历极为简单与普通，不过年幼时丧失父母，生活中吃了不少苦头。15岁参加新四军，历经五年硝烟弥漫的战争生活；全国解放后便转业到地方补习文化，后来上大学，再去中医学院进修，一共读了九年书；完成学业后，我一心只想当一名称职的内科医生。

在大学念书期间，一心崇拜的是那些专业理论水平高、临床经验丰富、学问博大精深的著名教授，而且更敬重书卷气重的专家学者。他们是我心目中的榜样，指望自己将来能成为一个有真才实学、受人敬重、名望较高的医生。

我在政治上一直比较幼稚，上级命我去西花厅工作时虽然已是三十三岁的人了，依旧同“三门”干部差不了多少，属于阅历浅、涉世未深、不谙世事的人。无论对人或对事还是那么幼稚可笑！

让我去周总理身边工作，心中实在没有底。我禁不往常自问：我能行吗？但想到自己是共产党员，应有组织观念，领导上的信任不能辜负。

是年12月，我去西花厅正式报到工作时，已经朦朦胧胧的意识到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决不是件简单轻松的事情。在这样高层政治圈内工作与生活可能会遇上一些重要的事情，担心自己适应不了。我常常提醒自己要牢记“三不”，即除了本职工作外，对其他事情尽可能不看、不听与不问。保健工作要绝对仔细谨慎，按我们老部长说的“多请示、多汇报、勤观察、少用药”的精神办事。

第十节

周恩来爱上了海棠花盛开的西花厅，一住就是26年；陈毅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自天安门广场往西经过新华门继续向前直到府右街南口（六部口），由此向北转弯沿中南海红墙一直到达近府右街北口处，见到那个有国徽的西北门往里向左手一拐便是西花厅。

西花厅坐落在中南海大院西北角，是清末宣统年间修建的那种京城常见的旧王府式四合院建筑群。因年代久远，青砖灰瓦的屋宇，廊柱暗红陈旧，雕梁画栋亦已褪色斑驳，已不见那昔日王府的豪华气派。

西花厅由前后两个院落组成，前院进门不远处可见一座小假山屏挡路人视线，茂密而细长的修竹环绕着它。院内自南向北的一条弯曲长廊隔在汽车道西侧，长廊中段设一凉亭，它的南端往西拐到尽头处筑一小巧的水榭，池子里没有放水，也就没有鱼虫水草和莲藕，常年涸着。如今西花厅院内的

房屋、亭子、长廊、水榭等建筑物看来已相当陈旧，但整个院子绿化得很好，树木花草繁茂，修剪整齐，院内环境幽静，空气清新，略有一点花草芳香，树上的知了鸣叫不停。

西花厅前院有一个漂亮气派的前厅，建在约一米高的平台上，是周恩来接待与宴请外国宾客的地方。平台下边有一椭圆形花坛，四周栽种低矮的常青树环绕，中央栽着周恩来和邓颖超都喜爱的芍药花和月季花。花坛亦是交通标志，是来往汽车的环形岛，周恩来和邓颖超经常来这里散步赏花。

西花厅的海棠花向为中南海及熟悉总理家的人士所称誉。每年初夏时节，后院里的海棠花盛开，每棵树上开满了红色和白色的花朵，芳香四溢，引来无数彩蝶纷飞、蜜蜂嗡嗡地叫着忙个不停，在此优美而宁静的环境里，蕴含着盎然生机。

后院的面积不大，是周恩来办公与居住区。一片绿地上满院海棠树，有几棵梨树、桃树和白皮松。周恩来办公室在坐北朝南的正房里。红色的廊柱绿色的窗框，下面的窗户镶着大块玻璃，上面是纱窗再加玻璃窗。每当天空晴朗、风和日丽与温度适宜的时候，打开面向院子的玻璃窗，拉开白色的窗幔使阳光直射进来，室内光线充足，顿时亮堂起来。

周恩来办公室西隔壁有一个稍大些的房间称作“活动室”。室内有一张乒乓球桌子，北侧与西墙根处立着书橱，里边藏书主要是属于文、史、哲类的图书。西花厅的工作人员将“活动室”习惯地称之为“乒乓球房”，或干脆就叫“球房”。打乒乓是周恩来在办公间隙唯一喜爱的活动腿脚的方式。常有警卫、秘书、医生陪他打球。周总理右臂肘关节伤残屈曲，活动不方便。我陪他打乒乓球时，他已年近古稀，不可能挥拍抽杀，就像董必武说的，是打“卫生球”。

西厢房为工作人员办公处，东厢房为临时“客房”，来客作短暂住宿用。我在西花厅十年只见过周恩来的亲侄女在这里短期住过几次外，未见过别人来住过。

办公室往东是客厅，现在时髦的说法可称之为“多功能厅”。这儿是周恩来、邓颖超用餐、休息的地方，也是两位房主人在此会客，与亲属团聚所在地。邓颖超在此看电视。

由客厅往里（朝东）便是邓颖超的办公室兼卧室。邓大姐卧室隔壁是周恩来的卧室，周恩来卧室的东墙外是一条内走廊。这里有书架，存放一些旧书刊与文史资料类图书。当初设计这条内走廊的人，谅必考虑冬季保温，夏季隔热以及隔音作用。

周恩来卧室内家具陈设极其简单。因为他一进卧室就上床，身后用枕头垫着斜靠在床头继续办公。他睡的是一张普通木床，下面用的是南方人喜爱的棕绷床垫。这很可能同他祖籍是浙江绍兴，生长于江苏淮安，依然保留某些南方人的生活习惯有关。

各房间和卫生间都由内走廊连接出入。走廊出口处是夜间警卫值班室，周恩来进卧室休息后，通向周恩来卧室走廊的门就锁上了，钥匙由警卫员保管。

周恩来若是夜间找人，只要按枕头边的电铃按钮，警卫人员会立刻跑到他的身边。厨师、医生及护士值班的房间建在走廊外的一排配房里，每个房间都装有电铃供随时呼叫之用。

周恩来居住在西花厅，一直过着俭朴的生活。这从他居住的房屋及院

落都可以看得出来。自他住进来以后，不许装修与翻新房屋及庭院。

60年代初，周恩来身边工作人员乘总理出国访问的机会，为了保护与加固建筑物，他们抢时间只搞了点简单的内装修，更换了窗帘、洗脸池与浴缸。周恩来回国见了十分生气，将他们狠狠地批评了一顿。事后，他语重心长地对身边人员说：“我身为总理，带一个好头，影响一大片；带一个坏头，也影响一大片。所以，我必须严格要求自己……你们花那么多钱，把我的房子搞得那么好，群众怎么看？一旦大家都学着修起房子来，在群众中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周恩来的这一番话发人深省。自此以后，再没有人敢提及装修房屋之事了。

邓颖超在悼念周恩来的文中说：解放初期你偶然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整整居住了26年，这里始终保持着庄严、幽静、美丽与朴素的开国总理风格。

正如陈毅元帅所说：“廉洁奉公，以正治国者周恩来也。”

第十一节

邓颖超初次约见并送我一本她写的书《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

1965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接到总理办公室电话通知，说是邓颖超大姐约见我。我虽然经常出入中南海工作，但去西花厅这还是第一次。

不过，我热心的同事在向我交班时，对周恩来与邓颖超的健康情况及西花厅工作的要求都说得十分详细，为的是让我尽快熟悉和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他这样做，既出于自己的责任心，也是对我的关心爱护。应该说，我对他是十分感激的。

周恩来对工作极其认真细致，他办事情既严格又严厉，他批评任何人时都不讲情面，这在“海里”工作的人们都是知道的。

再说，周恩来视时间如生命，对他来说，的确是“寸金难买寸光阴”。他没有时间，绝对不愿意把时间“浪费”在诸如健康检查或去医院看病这类事情上。

此外，人们只要一提起周恩来的工作，都会说他没有白天黑夜。他常加班加点地工作，连续“熬夜”好几天。可以说，这在党中央领导人中恐怕很难有能够超过他的人。

邓颖超大姐曾讲过一个小小的“故事”：以前中央考虑请刘伯承给恩来当参谋长，刘帅知道后忙说：恩来熬夜的本事实在大，我可熬不过他，还是另外请人吧。周恩来听说后并未介意，仅是一笑置之。

所以，保健医生要跟上周恩来的工作与生活节奏，你必须掌握好“火候”，即尽可能在他工作的“空隙”（实际上很难说有什么“空隙”），或者说

是不太“忙”，情绪比较轻松，起码少影响他的工作情况下，设法得到周恩来对保健工作的“配合”与“默契”。这可算是保健医生工作的“技巧”，相当重要。在这方面，邓颖超的帮助是必不可少的，事实上也是如此。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当好周恩来的保健医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就本人而言，我只能说是在照料周恩来的医疗保健工作上尽了一点心出了一点力。

中南海里要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挑选符合要求的服务人员，有关部门考虑政治标准第一是应该的。这不仅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里，即使在今天的中国，或者西方国家也都这样做。因此干部部门对被遴选的人员进行严格的政治审查是绝对必要的，也是可以理解的。我认为自己所以被选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除了本人根正苗红出生红小鬼、曾在多位中央领导人身边服务过以及有人推荐等因素以外，我学习过三年中医大概也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

邓颖超的母亲是一个很好的中医，邓颖超十分敬重她的母亲，她也很相信中医、常请著名老中医给周恩来看病，她本人看中医、吃中药常年不辍。

邓颖超约见我那天，我骑着自行车急急忙忙由北京医院赶到西花厅时，周恩来还没有起床，总理值班室的工作人员将我引进客厅休息等候，茶几上已泡好一杯清茶。

客厅西墙边竖放着一面很大的穿衣镜。我站在那儿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扶正了眼镜，仔细看看自己衣着等有何不妥。

这时，我心里正在想邓颖超大姐约我来之前，肯定已看过我的档案材料，她还会从各方面了解我的情况。她现在叫我来，谅必是要亲自见见我这个人，通过与我交谈对我有更多的了解。这毕竟是要为周恩来物色一个成天跟随在身边工作的保健医生，她也想“选”得准一点。只等了片刻工夫，邓颖超从她的办公室向客厅缓缓走来。我立刻起身迎上去同她握手，并轻轻搀扶着她坐到小沙发上。

邓颖超正在病中，她的身体显得瘦削而虚弱，面部气色稍有点苍白。她笑盈盈地跟我打招呼：“你是张佐良大夫吧？我早就想见见你，因为身体不好，一下子拖到今天，这两天天气太热，你是骑自行车来的吧？”

“是的。”我答道。

她见我有点拘谨的样子就说，“你在这里不必拘束。”她指着茶杯又说，“先喝点茶，咱们慢慢聊。”

大姐说话声音轻微，慢条斯理，吐字清晰。她的话音带着一口好听的京腔。她一面跟我说话一面从茶几上拿起一把蒲扇递给我。邓大姐的和蔼可亲消除了我来西花厅之前的紧张心理。

她在简短地询问了我的家庭成员及个人经历后关切地说：“你从小没有爹妈是个孤儿，吃了不少苦，15岁参加革命队伍又是个红小鬼。你现在大学毕业，当上了大夫，这很好，但也不容易啊。我的身体一向不太好，常年看病吃药、是个药罐子，所以跟大夫打交道多，大夫是个治病救人的崇高职业。”

稍停后，邓颖超向我介绍了自己的健康状况。她正患着胆道疾病、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植物神经功能失调和过敏性结肠炎等多种疾病，睡眠差，食欲欠佳、消化不良，身体瘦弱。说话间，我见她不时用手帕擦汗，并有一点气急。

“今天说话时间太长了，请大姐先休息吧，别累着了。”我建议道。

“有点累，但还好。你随我到房间去，我躺着再跟你聊一会儿。”我待她说完便扶她进卧室躺下。

邓颖超卧室兼办公室的房间不大，陈设简单、朴素实用。房间中央头南脚北地放着一张双人床，床头两侧各置一个床头柜，右侧放一部手摇电话，左侧放闹钟及手电筒等物；靠南墙玻璃窗处安放桌面铺绿呢的大办公桌；一对扶手小沙发置于东墙边，沙发中间设一只茶几，两个玻璃书橱靠墙而立；朝脚跟的墙上面挂着她母亲一张放大的半身肖像。相片上老人露出慈祥的微笑，只要邓颖超一躺下便面对母亲慈爱亲切的笑容，可见她对母亲孝心至深。

此外，房间里再没有任何装饰品。我端了一把椅子坐在她右侧床旁。

“你到我们这里来，不必紧张，也不要拘束，可以随便一些。以后我们会常见面，我向来尊重大夫，我把你们大夫当同志和朋友。我的身体不大好，经常跟大夫打交道，得到大夫不少的帮助。我同他们合作得很好。”她又接着说了起来。

“我们都是共产党员，组织上派你到我这儿来工作，你的任务很重啊。”她停了一下又说道。

少息，她向我介绍了总理办公室的秘书、警卫、司机、厨师和服务员等情况。

“我们这儿人不多，就我跟总理两个人，无儿无女，没有家属给你添麻烦。大家对总理就称呼‘总理’，这是他的职务；对我，他们都叫我‘大姐’；这样称呼很随便，很自然，千万不要叫我们‘首长’。总理的工作很忙，他一天到晚只知道工作，不注意休息，自己觉得身体好，不在乎，又不听别人劝。他是个急性子，你跟他说话要简明扼要，不要绕圈子，以后，你常跟他在一起，就会知道这些的。”她说完，便拿起一把小蒲扇在手里摆弄着。

“还有，他问你什么事情，不知道的就说不知道，不懂的就说不懂，只要老老实实，他是不会怪你的。今后，你在工作上遇到什么不明白，或难办的事情，可以来问我，我会帮助你的。那些警卫同志也会帮助你的，大家一起努力把工作做好。”她讲完这几句话，即侧过身去拿起手表看了看说，“哎呀！快 11 点了。好吧，今天咱们就说到这儿，以后我会跟你联系，我会尽快找一个机会让你跟总理见见面。”邓颖超伸手按电铃叫服务员进房间来帮助她起床。

“谢谢大姐对我的关心，向我介绍了这么多情况，我会牢牢记在心里。我有信心做好工作，请大姐放心，您多保重身体。您什么时候需要我，我一定随叫随到。”看来谈话到此结束，我站起身来说。

“等一下，还有件小事情。”她边说边向办公桌走去，从桌上拿起一本《以革命者的坚强意志战胜慢性疾病》为书名的红色封面简装书。说：“这本书，你拿去看看，我对待疾病的态度都写在这里面了。”

我打开扉页，只见用钢笔写的娟秀字迹跃然纸上：“佐良同志惠存！邓颖超 1965 年 8 月 20 日”，我小心地将书放进书包，激动他说：“谢谢您，大姐。”

“回去向你家里人问好。”邓大姐伸过手来同我告辞时说。

“谢谢，谢谢。”我用双手轻轻地握着大姐瘦骨嶙峋的手连声道谢告辞回家。

此后，我有幸在西花厅整整工作了二十年。在周恩来和邓颖超的亲切

教诲及言传身教的熏陶之下，使我在怎样做一个光明磊落、正直的共产党人，正确对待工作和生活态度问题上获益匪浅，终身受益。

周恩来对中国革命的伟大历史贡献是举世公认的，这在我担任周恩来保健医生之前尚没有后来那样深刻的认识。

第十二节

周恩来的“第二办公室”和“第三办公室”

解放初期就在西花厅工作的老同志把周恩来的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正如邓颖超所说的：“他呀，一天到晚只知道忙着干工作，就是不注意自己的身体。”

周恩来一天的工作是从“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就开始了。他睡得晚，起床也晚，这里所谓的“早晨”大多是近中午时刻，甚至到下午一两点钟，偶尔会更晚些才起床。

西花厅的服务人员一清早便将卫生间打扫干净，一切生活用品都备齐；白天拉开窗帘打开窗户进行通风换气，夜间则关上窗户拉上窗帘使室内既保持空气清新亦使室温相对恒定。

有人向我介绍，周恩来很注意自身的修饰和仪表。他穿的中山装及衬衫都熨烫得平平整整线条笔挺；皮鞋擦得锃亮锃亮的。他花白的头发向来梳理得很整齐，隔一天刮一次胡子，若有外事活动则每天刮一次。他本人如此，自然也要求身边工作人员服装穿戴必须整洁，不可邋遢。这些看来是生活上的小事情，实质上同周恩来年轻时所接受的教育，同他以后的自身修养洁身自好有关。对一个领袖人物来说，其外表形象亦不能说是他个人的“小事情”，因为他是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与人民的素质。

有一次，周恩来在卫生间洗漱，看到一位工作人员的皮鞋比较脏，他就说：“你的皮鞋这么脏也不擦擦，你没有皮鞋油啊？快去，用我的皮鞋油擦一擦！”这件事很快在工作人员中间传开了，后来，大家都注意服装整洁、皮鞋干净、及时理发和刮胡子。

周总理每天起居作息等生活习惯与工作安排是，“早晨”醒来一睁开眼睛便看手表。他偶尔按电铃叫人进去询问有何急事需要处理，要是时间许可，他也觉得困乏而没有睡够便接着睡。不然，他便按枕头边的电铃呼叫值班警卫人员，他们听到铃声，便进周恩来卧室随他一起到洗手间。

周恩来进卫生间后，有时坐在抽水马桶上就按电铃（电铃按钮在马桶旁的小条几上），把值班秘书叫进来，向他报告电话记录、待批阅的紧急文件和一天的工作安排等。有时候，他叫人（多半是周恩来熟悉的老部下）到卫生间来汇报工作，交谈的时间是几分钟，也可长达几十分钟。所以，日子一长，西花厅的工作人员赋予卫生间一个雅号叫做“第二办公室”。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医院值班人员通知我马上去西花厅。我骑上自行车急急忙忙赶到了西花厅。

自从1964年毛泽东严厉的批评了卫生部在医疗保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

不合理制度和脱离群众的现象后不久，我调到了医院总值班室工作。

那时候，由于取消了专职保健医护人员，每一个医生或护士要兼管多位医疗对象。我一个人就兼顾了六、七位中央首长的保健工作。况且我正准备随邓小平去云、贵、川三省视察三线建设工程。所以直到12月“上海会议”结束返京后方去“总理办公室”报到。

1965年8月那一次邓颖超约见我，主要是她在看过我的个人档案材料后，再想看看我本人，彼此认识一下，通过谈话可以对我有更多的了解，亦便于她向周恩来作介绍。果然，在邓大姐约见后不几天，周恩来便在“第二办公室”接见了我们。

“不要急，总理还没有起床，我们估计他快要打铃了，叫你提前到这儿来等着，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代的。”值班室的人向我解释道。

若在近中午时刻，周恩来卧室电铃响的时间比较长，便是他“清晨”起床，召唤管理他生活值班人员的信号。

不一会儿，值班室的电铃“吱……吱吱……”响了起来。

他们进去照料总理起床洗漱和更衣。我走进客厅，对着大穿衣镜擦去了额头的汗水，用手理了一下头发，整整衣裤，看看没有什么不妥，便想去叩邓颖超办公室的门。

“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他见你一面，你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会叫你一起去见他，”邓颖超来到客厅笑盈盈地对我说。

周恩来的工作太忙，生活节奏快，在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决不能迈着四方步慢悠悠地走路，他们听到电铃声都是跑步到总理身边。今天，邓颖超见缝插针安排我来见周恩来真是不容易。

片刻工夫，就有人来到客厅引我去“第二办公室”。大姐在卫生间门口见到我，她轻轻地叩了一下门即推门进去，我跟在她的后面。

“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张佐良大夫。”她向周恩来介绍说。

这时，周恩来刚做完晨间操，身上穿着白底蓝条睡衣在洗漱。

以前，我多次在天安门城楼与人民大会堂等地方见过周恩来，都没有靠近过他。但伫立在总理面前同他说话还是头一次。我时刻牢记上级领导的嘱咐：“保健医生在中央领导人面前要做到不卑不亢与落落大方。”此刻，我内心虽感到有点紧张，但尽力克制住，保持镇静和注意言谈举止。但我可以想象自己当时那副“尊容”：一定是融兴奋、激动、紧张、不自然于一脸。

我看见年近古稀的周恩来面部气色很好，皮肤白皙略微红润，细看有一些“老年斑”。

他头发斑白，两鬓染霜，额头和眼角处皱纹较浅，眼袋不明显，两颊的落腮胡子刮得发青，浓眉下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精神矍铄。

“哦，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家乡在什么地方？”他面带笑容同我握了一下手，右手拿毛巾继续擦脸，并用人们熟悉的苏北口音问道。

“我出生在上海，故乡在浙江硖石，幼年时由大人领着去过几次，现在已没有什么印象了。‘八一三’战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领养到了苏北，1947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经过补习文化考进上海第一医学院学习。”我怕耽误他的时间，将事先准备好的“腹稿”简要急促地向他作了自我介绍。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他停顿了一下，接着问，“你

有几个孩子？”

“一男一女共两个。”

“好么，你来了，我这里也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大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谈话就这样结束了。我马上告退出来随邓大姐到客厅。

“今天，他总算见了你一面，又跟你说了几句话，看样子对你的印象还不错。你也见到了吧，他实在太忙了，时间不够用。我跟他一天说不上几句话，有时，甚至一两天都见不上面。说起来，别人还不会相信呢。”我们回到客厅在沙发上坐定后，邓颖超说。邓颖超苦费心机安排在“第二办公室”让周恩来见我一面，目的是看他对我的印象如何，是否适合到他身边工作，这毕竟是为周恩来挑选保健医生，应得到他的认可。虽说我被周恩来初次召见是在卫生间，时间只有几分钟，说话三言两语，却使我同他老人家之间有了长达十年的缘分，直到这位人民的总理告别人间。

假如“老资格”的周恩来办公室工作人员将卫生间戏称为“第二办公室”的话，我可将卧室称之为“第三办公室”。周恩来起床后便到“第二办公室”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但周恩来是在卧室的床上结束一天工作的。

周总理每天深夜或凌晨离开办公室去卧室时总抱着一大摞文件。邓颖超把这一摞文件戏称为“他每天总抱着金娃娃”去睡觉。

周恩来洗漱完毕进卧室躺到床上，继续看着“金娃娃”，批阅文件，常常在疲惫不堪时打瞌睡。手里拿着的红铅笔在文件上圈、点、划，到后来则划出一道道弯弯曲曲不规则的线条。有时，我站在旁边劝他休息，他很少答应，只是叫人拿热毛巾擦一把脸，拿点花生米或者苏打饼干给他“充饥”，我看出，其实他是想借此驱除“瞌睡虫”。有时，等人家取来花生米，他已呼呼地靠在床头睡着了，握在手里的铅笔已掉在了地上。

第一节

风风雨雨西花厅

周恩来冒着余震的危险视察邢台地震灾区；他接过农妇送来的水碗就喝

1966年一开春就没有春意。人们正在呼呼熟睡的时候，河北省邢台地区突然发生六七级强烈地震，这是全国解放后第一次发生在人口较稠密地区的强震，遭灾面积达三十多个公社、近四十万人口，损失严重。

邢台地震波及到北京地区。地震时，我家在北京医院小平房顶上吊着的电灯被震得晃来晃去，房顶上往下掉了不少灰尘，听到院子里有人大声喊叫“地震了！地震了！”不一会儿，院子里聚集了许多人，吵吵嚷嚷地说着话。

这是我平生头一次领教到地震是怎么回事。

周恩来得知邢台地区发生地震的消息后，当天在国务院会议厅召开紧急会议。他了解震情、灾情及商定抗震救灾工作部署，并向党中央和毛主席

报送了书面材料。

他促请以国家科委和中国科学院为主同有关部门组织科研力量赴地震现场进行观察、探测和研究，判定地震范围、性质和方向等详细情况，将我国地震预测预报工作大大地推进一步。

这一年春天，河北省可说是祸不单行。石家庄与邢台地区发生流行性脑膜炎大流行。我随周恩来出发赴邢台之前，从卫生防疫部门了解疫情并作了相应的准备。

3月9日是农历二月十八日，惊蛰后第四天，天气还很冷，年近古稀的周恩来穿着一套丝绵质地的中山装上了路。他冒着余震的危险赶赴灾区视察慰问。

他轻装简从，只带少数随行人员乘专列向石家庄疾驶而去。他在列车上办公，不时打电话了解灾区情况，并同中央书记处主持日常工作的彭真（兼北京市委第一书记）通电话沟通情况。

当天下午，专列在石家庄停了下来，专列上的人都感到列车时有轻微的晃动，表明余震未息。周恩来下车听取了地方领导人简短的汇报后，不顾自己的疲劳即乘直升飞机去视察震情最严重的地区。一架直升机只能容纳几个人，他让我留在石家庄待命。

受灾地区余震阵阵，大地在颤动；少数地段震开了长达一米多宽的地面裂缝，正在冒着带热气的黑水。寒冷刺骨的西北风紧吹着，干部和群众见到周总理自来灾区视察慰问，一股暖流涌向心间。党和政府对老百姓的关怀，极大地鼓舞了人民抗震救灾的信心和决心，他让老乡们背北面南以避寒风，自己迎着北风站在木头箱子上向灾区人民作了真切而感人的讲话，使到会的人感动得热泪盈眶。

在这幅感人至深的照片上，见到旷野里的群众席地而坐，周恩来不穿大衣不戴帽子站在木箱上，神情严肃，那只人们熟悉的右臂弯曲地垂在胸前。他举起左手伸出食指比划着讲话，在他的背后停着一架直升机。这就是领袖同人民在一起的千万个历史镜头中的一幅真实写照。

周恩来察看老乡们倒塌了的房屋、毁坏了的田园庄稼，关切地同他们交谈，要求干部具体安排好群众的生活和生产。

在视察中，他向干部和群众提出了“自力更生，奋发图强，发展生产，重建家园”的指导救灾工作方针，并具体规划了灾后的生产与群众的衣食住行。老乡们在激动之余亦不免为总理的安全担忧，告别时依依不舍。

至傍晚，周恩来一行回到石家庄继续开会，夜间专列停到铁路支线上，他办公至深夜，住宿列车上。

3月10日，余震依然不断，大地时时在颤抖，当地领导同志陪同周恩来继续视察灾情与抗震救灾工作进展情况。正当汽车往前直驶时，周恩来忽然叫司机停车，他要下车去亲自看看地方上没有安排他视察的小村子。

这里是一个小村庄，地震后留下一片破败荒凉的景象。周恩来踏过残砖断瓦进入村庄看望群众。他走进一家农户，房子是北方农村常见的用泥坯建成的土房，房顶开着“天窗”，不知道是地震破坏的还是原来就这个样子。房主人不在家，屋子里有一个衣服破旧、微敞胸怀、头发蓬乱、约莫三十来岁的农妇坐在炕沿上怀里奶着婴儿，脸部菜色，身上脏兮兮，另有一个两岁的小男孩趴在她的膝上。屋子里只有一个炕、一个灶和几只旧的木头板凳，墙旮旯里竖放着几把锄头、铁锹等简单农具，有人赶到她面前说：“周总理看你来

了！”她听了既不惊也不喜，一声不吭地用两只眼睛直盯着说话人；看上去有点胆怯的样子，她听不懂那个人说话的意思。

“北京来的周总理，来看你们来了！”那人又加重语气大声说了这么一句话。她仍未开口说话，只是欠了一下身子，往旁边稍微挪动了一点。

周恩来见此情景便主动走过去坐到炕沿上，他用手轻轻地抚摸着趴在母亲膝头那个男孩的头。地方上的领导和随同人员站在屋子里，门口已聚集了许多人，都是闻讯赶来看“热闹”的。

“你家有几个孩子啊？”总理问道。

“三个。”这时她低着头轻声回答道。

“你男人呢？”

“他出去了。”

“你家每年从地里收的粮食够吃吗？”周恩来见了这个没有文化但质朴的农民，便直奔主题。

“不够吃。”她答道。

“年底能分到多少工分？”总理再次细问道。

“我家年底没有工分，还欠三四十块钱。”这一次，她听明白了，或许，她知道是北京的“大官”来了。她直率地回答了周恩来的提问。这也是周恩来视察灾情顺便想了解农民生产、收入和生活的真实情况。

这个时候，农妇站起身来走到灶台边拿起一只粗瓷碗，从水缸里舀了一碗水端到周恩来面前。他接过瓷碗说了声“谢谢你”就喝了一口，他看了我一眼。我见到那只瓷碗边上有未洗净的玉米面，碗边有多个破损缺口，但我不敢言语，更不敢朝前去阻拦他喝这碗里的水。

我是保健医生，自然担心他传染上肝炎或其他胃肠道传染病。西花厅素有保安全、保健康和保工作的“三保”之规，但我怎能妨碍领袖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呢。周恩来又简单地问了几句话便告辞出来，坐上汽车继续视察灾情。

周恩来清楚地知道一户公社农民，在面向黄土背朝天地干了整整一年之后，仍然解决不了温饱问题。可见中国的农业问题是何等的严重。这使他对农业生产状况陷入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忧虑。我国人口中百分之八十是农民，农业始终是个大问题！周恩来的心情更加沉重起来。

近中午时刻，车队到了一个水库工地。周恩来走下汽车，修水库的人群老远就看到了他们所熟悉的身影。工人们狂蹦乱跳地欢呼着，也许他们事先得知周总理要到工地来。周恩来向大家挥手致意，水电部钱正英副部长也在工地上。周总理过去同他们握手过后，带头盘腿席地而坐，大家紧挨他坐下围成一圈。

“喔，已经十二点多了，大家一起吃午饭吧！”周恩来看了一下手表同身旁的人说。

大家相视了一下，一个干部模样的人高兴地叫人把饭菜端上来。工地上吃的当然是大锅饭，用脸盆盛的煮白菜，主食是玉米面饼子，大家没有洗手擦脸的讲究，我们围坐在另一个圈子里，各人拿起饼子掰开便吃，大家有说有笑的吃得很开心。饭后开会座谈，进一步了解水库建设和地震对水库的影响等情况，发言者畅所欲言不感到拘束，我们直至傍晚才离开工地。

“你今天表现不错嘛，没有来干涉我喝水吃饭是对的。你要懂得，我们不能脱离群众。”晚上回到专列上更衣洗漱时，周恩来对我这样说。

我到西花厅工作不久，就有人跟我交代总理办公室立下的“三保”规矩。我只有好好执行的义务，绝对没有违反它的权利。

当汽车离开水库工地返回石家庄途中，已是日落西山、晚霞满天时刻，在一处距公路 100 米左右的田野平台上有四五个妇女在推水车。周恩来看着觉得有些奇怪，她们为什么还不收工？他让司机停下车来，走过去看个究竟。

周恩来打开车门，立时听到妇女们在边推水车边唱歌。他下了汽车朝她们走过去。由于农村生产落后生活穷苦，不要说是女的就是男的也大多读不起书，她们没有文化，加之交通及通讯不发达，听不到广播，没有、也看不懂报纸，那时更没有电视机，所以，她们不认识周总理。周恩来走到她们跟前亦未引起惊讶或兴奋，而只是停止推水车，站在那里出神地看着我们这些陌生人。

“你们是哪一个村的？这么晚了还不收工啊？”周恩来问道。

“你们不认识啊？这是北京来的周总理。”旁边有人告诉她们。她们中好像有人知道周总理是谁，是“大人物”，她们都大声的笑着，大家都笑了起来，周恩来也跟着笑了。“咱们就住在那一个村，今天的活儿没有干完咋能回去哩。”她们中有人用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个村子说。这里受地震灾害小一些，未见到明显的破败现象。

“你们为什么一面推水车一面唱歌，这是谁规定的？这么做很累。你们可以喊劳动号子嘛，也可以什么都不喊。”周恩来又问又解释道。

“哈哈，哈哈，我们不累……”她们没有回答周恩来的问题，只是笑着，周恩来同她们一一握手告辞。

“不知道这是哪个人规定的，边劳动边唱歌，搞形式主义，妇女能参加这么重的体力劳动已经不容易了，你们不能强加于人嘛。”他回到汽车旁跟地方上的领导同志说。

此次，周恩来亲自到地震灾区视察工作，顺便了解国家的农业政策（如工分制）、农业生产、农民生活、干部作风等一定程度上带有普遍性的民情，他为老乡，为中国农民的状况在深刻地思考着。

第二节

周恩来办公室门锁有三把钥匙，邓颖超却没有一把；邓颖超也有抱怨，但夫妻俩终身相濡以沫绝非偶然；周恩来急促地呼喊：“小超啊！小超……”

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是我在西花厅工作最重要的时期，直至 1976 年 1 月 8 日周恩来故世。

我亲眼目睹了周恩来在“文化大革命”浊浪滔天期间政治生涯的一些侧面。我，作为周恩来的保健医生只能按职责做好自己份内之事。遵照中央领导人身边的工作人员一茬又一茬传下来的未成文规矩：不该看的不看、不该听的不听，当然不该问的就更不能问了。因此，我虽然贴近周恩来的日常生活，但对他的高层政治生活几乎是全然无知。这连他的亲密战友、终身伴

侣、与之共同生活了几十年相濡以沫的邓颖超大姐亦很少晓得中央发生的许多事情。

但是，即便如此，因为你毕竟生活这样的高层政治环境之中，偶尔也会有一些事情在意想不到的情形下，突然向你迎面而来，真是连躲也躲不掉。

周恩来的一生，他的方方面面无疑都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楷模。他可能是长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养成非常严格的保密观念。就拿他办公室门锁的钥匙这么一件事来说，他规定只有三把，秘书有一把，便于他们出入办公室整理文件等；警卫人员有一把，便于清洁和整理房间；他自己保管一把成天揣在兜里不离身。

邓颖超手里没有钥匙，她要进办公室，通常也得先敲门告知一声再进去，这是他们夫妻间相约的礼貌与规矩。

周恩来办公室的房间不大，约三十平方米。当你推开办公室的门，立刻有一种房间狭小拥挤的感觉，因为屋子里的东西堆得满满当当，空间太小了。

办公室地上铺设绿呢地毯，沉重的玻璃书柜摆在东西北三面墙前。室内有两张铺有绿呢台布的办公桌。一张普通的大办公桌朝南临窗摆放，桌上放了许多文件、文具等办公用品，有一个老式铜座绿色灯罩的台灯。这张办公桌的右侧几案上摆了三部电话机。

另一张办公桌，是一张如乒乓球桌大小的长条形会议桌，沿房间东西向横放着。它几乎占居整个房间四分之一的面积。任何人推门进去首先映入眼帘的便是这张醒目的、堆满文件的长条形会议桌。桌上的台灯是自制的，有两个 20 瓦日光灯管。早先因为办公室里秘书多、分工细，故周恩来办公桌左手下方安装一排标有秘书名字的电铃按钮，便于总理呼叫各位秘书，“文革”开始后，秘书逐渐减少，最后只有两个人，这排电铃装置也失去了作用。

长条形办公桌上放着一摞摞大小不等的文件堆，就像高矮不一的“小山包”。会议桌的东头留了一点空间，周恩来常在此进餐或接待个别来访客人在这儿谈话，放置茶杯等物品。

时下人们常说“文山会海”，周恩来办公桌上的“小山包”可说是地地道道的“文山”了。

周恩来每天都要出席或主持各种各样的会议，还有外事活动等，而家里每天又有那么多文件等着他亲自来批阅。他能不忙不累吗？！

那张临窗办公桌的左手侧放着一个扶手小沙发，那只是一种摆设而已，很少见他坐在这张沙发上休息过。

“文革”初期，因为周恩来多次发作冠心病心绞痛，后来在办公室的西北角安放了一张木板单人床，供他躺在那里小憩，充充电、养养神，或是午睡片刻，以及心脏病发作时卧床休息、服药、作心电图和吸氧气时用。

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单人床的功能慢慢地发生了演变，床上没有了被褥枕头等卧具，而是堆满了文件。原因很简单，就是周恩来没有时间躺到单人床上去“充电”！

周恩来工作常常因过度劳累而使他感到胸部憋闷不适。他常感到房间里空气不够用。其实是冠状动脉供血不足引起心绞痛的表现，这是经心电图检查一再证实了的，但他不肯，确实也没有时间专门躺在床上休息吸氧气。在专家指导下，我们自行设计了一套“土造”中心供氧装置，通过曲折的管

道系统将氧气直接输送到他的办公桌旁。周恩来在办公室里不知不觉地边办公边吸氧，这样，保证了定时定量供给氧气，亦减少与减轻了冠心病的发作。

我在周恩来身边十年，他有永远开不完的会，真是白天晚上一个接一个的会。参加会议的人员、陪同周恩来出席会议或接见外宾的领导人都来自不同的单位及部门。他们一批又一批的轮着来，唯有周恩来是一个人坚持着！

周恩来一回到西花厅，那张长条型会议桌上的“海拔”永远不会降低的“小山包”，总是等着他去批阅处理。周总理批阅文件绝对是细致认真。仅我所见周恩来批阅有关卫生工作的一些文件、领导人的病情报告等，文件上满纸都有他红蓝铅笔的划杠、圈点与批注，更不要说其他重要文件了。周恩来就是这样度过了无数个日日夜夜。

秘书们说，凡是机要部门送到周恩来办公室（“文革”期间改称“总理值班室”）来的文件，只要封面上写有“周总理亲启”字样的文件，秘书一律不得拆封，必须交周恩来亲自启封处理。他阅读与处理完那些“亲启件”后，亲笔在信封上写“退XX同志”，并亲自将文件封好。诸如此类的事情，有些领导人则授权给秘书，他们可以打开并阅读这类“亲启件”，起码能帮助首长“过滤”一下这类“亲启件”，看看是否一定要首长亲自处理，那样起码可以节约时间，亦少消耗一些精力。但周恩来不许这样做，谅必有他的道理，决非我辈能理解得了，亦非他不信任身边工作人员。

在周恩来身边工作期间，我明白自己只是个保健医生，不是机要工作人员，职责明确、绝不含糊，对上级领导有关“三不”的纪律教导时刻铭记心头。

但是，有时也会遇到这样一些尴尬的情景：比如当周恩来在办公室按电铃招呼人时，恰好身边其他人员临时忙别的事情去了，我在值班室听到铃声不得不权充“替补队员”立刻进办公室应召。

进房间后，我有意站在同办公桌稍稍保持一点距离的地方，避免能看清桌上那些标有“机密”、“保密”、“绝密”和“亲启”字样的信封与其他已经启封的“红头文件”。这里毕竟是机要重地，所有文件我都不该知道。我为了“火烛小心”，怕的是万一丢失了文件、暂时找不到某一个文件，或者是“泄了密”，我很可能首先成为“嫌疑分子”。

“你站这么远干什么，想避嫌啊？你在我这里工作，我是信任你的嘛！”周恩来一见我这副“模样”早看穿了我的心思，他用和缓而略带批评的语气说。

有时，周恩来在办公室里向我交办工作，此时恰好电话铃声响了，或者是总理临时叫秘书进来交代工作，每遇这种情形，我赶紧离开办公室。

“哎，你的事情还没有完嘛，不要忙着走开，我有不能让你知道的事情，会叫你离开的。”总理表示理解地说。我只好站在原地待命，你不想听也得听。

是啊，周恩来一看就透，说话一针见血。周总理和邓大姐确是信任我，否则也不会同意我到西花厅来工作。可是，我必须时刻保持清醒的头脑，明确自己的职责始终只是保健医生而不是别的，切不能因总理对自己的信任，我就在办公室里随便起来，松懈了“保密纪律”。周恩来的办公室无疑是机要重地，连邓颖超都没有一把办公室门锁的钥匙嘛：我怎么能随便靠近办公桌，任意扫描堆放在桌上的那些标题醒目的“红头文件”呢？

同样，我认为能够将电话直接打给周总理的，肯定不是小人物，也不

是小事，决不是一般家庭电话，老朋友间“道安”或闲聊家常。所以，尽管总理有过多次交代，但我决不会忘乎所以，以后再遇到同样的情形，我宁愿挨他的“训斥”，也不敢大大咧咧、满不在乎地呆在那儿听他跟人通电话。

我依旧每每遇到类似情形，照旧马上离开办公室。周恩来的工作那么忙，事情千头万绪，万一他一忙乎却忘了这档子事儿——他身边还有我这么个人“戳”在那儿，他同别人通电话的机密内容，一不留神就让我听见了。他可以对此并不介意，可我就不该这样做了。自然，在中央领导人身边工作的人都要靠自己动脑筋，灵活处理现场情况。周恩来在办公室里通电话，我任何时候都应当回避，除非总理吩咐要我呆在那儿。

我不能为这些小事每次都要等总理发了话，我才走开啊。我是组织上委派来照顾周恩来的，不是来给他添麻烦的。我应该对党负责，也对自己负责，顶多挨他几句“训”就是了。何况，邓大姐在我初来西花厅时就交代明白：“恩来的工作太忙，他的脾气急，有时他说你几句，你也别往心里去……”我的言行应当符合她的要求。

不过，请大家千万不要对此产生丝毫误解，以为在周恩来身边工作的人成天战战兢兢的样子，那岂不成了人们常说的“伴君如伴虎”了吗？其实，我这儿仅仅是说自己在初到西花厅工作时遇到的那种“特殊情况”之下的心理状态及处事方式而已。

一个初来乍到，不了解党中央高层领导人的政治生活，不太熟悉西花厅情况和处事“规矩”的我，会遇事紧张，小心谨慎也是很自然的心态。这或许是自己神经过敏吧？那些在西花厅工作有了年头的“老资格”们决不会像我那个样子。不然，天天事事处处大家都那样紧张、疑神疑鬼，还叫人怎么活啊？！

“你不要这个样子嘛，把我也搞得紧张了。”对此，周恩来曾这样说过我。

在以后漫长的岁月里，为适应西花厅的工作环境，我渐渐改进工作方法，再有老大姐和周总理值班室老同志的帮助，处事“稳重”了一些，不再那样自己紧张、让周恩来看看着也紧张，工作亦比较顺利一些。不然，你能在西花厅呆十年吗？

“文革”初期的一天上午，周恩来同平常一样，起床后到卫生间洗漱，警卫人员去忙于准备早点等事，我随侍在侧。

“昨儿夜里睡好了吗？中午不出去了把？”邓颖超关切地问周恩来。

“……”周恩来没有吭声。

其实，邓颖超由值班人员工作记录本上早已了解这些生活情形，她也从秘书那里知道当天的工作安排。

“我已让老桂（厨师）给你准备了虫草炖鸭子，我们好久没有在一起吃一顿饭了，今天一起吃顿午饭吧。人家说‘少年夫妻老来伴’，我跟你呀，连个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没等邓大姐往下说完，周恩来有点不耐烦了。

“哎呀，你在说些什么啊？我们中午一起吃饭就是了。”话音刚落，恰好秘书敲门进来向周总理报告工作，我随邓大姐离开卫生间。这时，邓颖超在刚进卫生间时脸上的笑容消失了，不高兴地回自己房间去了。

当时，我在一旁看到这种情形，心里同情邓大姐，有点埋怨周总理，邓大姐诚心诚意一大早到卫生间来向他“问早安”。她希望老俩口见了面能在一起好好呆一会儿，说说话，一起吃顿午饭。她想营造那种温馨的家庭气氛，才没话找话的说了这么几句极平常的玩笑话。

周恩来成天忙于工作，白天常去国务院、大会堂、京西宾馆或钓鱼台等处开会，参加外事活动或是找人谈话，很少在家里办公。他起床后只要一离开西花厅，大多在后半夜，甚至第二天天亮才回家。大多数情况是，周息来忙碌了一天从外面回到西花厅已是深更半夜，邓颖超已经睡觉了。

周恩来“早晨”起床的时候，刚好在邓颖超吃午饭或是睡午觉时间，待至邓大姐午睡后起来，周恩来已经又离开西花厅去了大会堂、钓鱼台等处，……进入第二个24小时“循环”。老夫妻俩的作息时间常常不同步，因而见不上面、说不上话。这一对革命伴侣缺少普通百姓那种温馨的家庭生活。

在“文革”动乱开始不久，特别是1967年上海“一月风暴”后，形势迅速恶化，一场全国性的夺权运动弥漫开来，全国的工、青、妇机构自上而下地纷纷垮台，邓颖超和蔡畅等几位全国妇联机构负责人被夺了权、靠边站了。

那时，邓大姐正疾病缠身，长期居家休养，在那动荡不安的岁月，她作为老一代革命家为党、为国家忧虑，为周恩来担心乃是常理。这时候周恩来的工作压力比之邓颖超当然要大得多。他心里装的是全党全国人民，国家和民族的兴衰存亡，其他一切事情都抛在了一边。

不过，夫妻终归是夫妻，更何况是患难与共几十载的革命夫妻。邓颖超肯定比我们更理解自己丈夫当时的心境。

到了中午，我们在值班室的同志听到老俩口在客厅里有说有笑的一起吃午饭，“早晨”在卫生间闹那么点小小的不愉快，早已冰释了。

周恩来办事认真细致，有条不紊，组织观念强，保密纪律严格，所以他对对自己的办公室也立下了严格的规矩，对自己的亲属也绝不例外。

还是在1964年初秋时节，周恩来在中南海勤政殿小会议厅主持召开“专委会”（中央核试验专门委员会）成员贺龙、陈毅、罗瑞卿、张爱萍等一起开会。总理在提到严格保密纪律的时候说：“保密问题非同小可……希望你们回家后也不说，不要一高兴就说出去。我老婆是老党员、中央委员，不该说的我就是不说，任何人不该知道的事就不要知道。”

60年代末夏季的一个上午，大约九点多钟，周恩来腋下夹着文件，刚离开办公室准备到卧室去休息。他知道邓大姐已经醒来正要起床，习惯地穿过她的房间去卫生间更衣。这时，他发现邓颖超正躺在沙发里，服务员使劲呼唤着“大姐，大姐啊，你醒醒……”一时唤不醒，邓颖超没有任何反应。

“小超，小超啊！你怎么了？快醒醒！”周恩来见状急得俯下身去大声地用呢称呼唤邓颖超。他的嗓音嘶哑了，夹在腋下的文件掉落在地上都不知道。

“你们愣在那里干什么？还不快叫大夫来！”看样子、周恩来真的急了。

这时，我已听到总理的喊声，急忙赶到大姐卧室。我用手电筒照了一下瞳孔，对光反应很好；测血压、呼吸及脉搏都正常；再用手掐“人中”与眼眉均无异常情况发现。我向总理郑重地报告：“总理，请您放心。大姐没有特殊情况，这是安眠药作用还没有过去，以前也发生过，等一会儿就会醒过来的。”总理似乎在用疑惑的眼光盯着我——意思是你这样说，有把握吗？

“总理，您放心的睡觉去吧。再过十多分钟大姐就会醒来了。”我再一次自信地向他重复了一遍。

就在我再一次向周恩来报告时，只听得邓大姐喉咙里“呜，呜”的发出了响声，她还皱了一下眉头，在场的人都看到了。总理见状也就放心地离

开了。

我在西花厅岁月漫漫十年间，遇到的这一幕，使我确信周恩来邓颖超夫妻恩爱，终身相濡以沫，绝非偶然。

我见到一些中央领导人家里有了第三代，三世同堂，革命老人也有一种含饴弄孙，暖融融、乐呵呵、浓浓的家庭气氛。他们也需要有温馨自在、和和美美的家庭生活。因此，他们再忙、在外边遇到任何不愉快的事，或者是一些压力，一旦回到家里把小孙子叫来拉到怀里一逗，有什么不痛快的事儿都会忘掉了，起码是暂时地忘记了。这也有好啊，至少有利于调节精神，稳定情绪。

邓小平喜欢孩子是人所共知的。60年代中，我上他家去时，常见他抱着小外孙在院子里散步，嘴里还哼着什么曲调似的。

在改革开放年代，广大电视观众都曾在电视荧屏上见到他老人家带着小孙子到机场迎接贵宾，或参加植树节活动等。这位老人家的襟怀真是海阔天空！

我还记得威镇四海、战功赫赫，但身患糖尿病的刘伯承元帅住在北京医院，医生对他的饮食严格限制。他是四川人爱吃腊肉，他让警卫员从家里带来腊肉，乘医护人员不在意，“偷偷”吃了起来。对于他，不论是医护人员、专家主任、医院院长还是他的夫人都拿他没有办法。尤其是老夫人要是在一旁帮着医生说话，他的脾气会更大，冲着老伴儿发火。唯一的“法宝”就是叫他不满十岁的小孙子来，准能把老爷子“管”得服服帖帖。

哎，这也可说是一种社会现象，儿子管老子不敢管，管不住；孙子管爷爷常常就很灵光。你说，这老爷子就是听孙子的，你有啥法子呢。甭管刘元帅曾经驰骋疆场，指挥千军万马，而今却被自己的孙子这么个小不点儿“管制”住了。这或许是人们常说的“老小孩儿”，是天性吧！

如今年过花甲的我，也有了小孙女，这样的体会正在慢慢地加深。我是周恩来身边一个普通工作人员，自然是以常人的眼光来观察与思考问题，我想周恩来是伟人，但他也是普通人。

邓颖超在《从西花厅海棠花忆起》一文中写道：“你不是喜爱海棠花吗？解放初期你偶尔看到这个海棠花盛开的院落，就爱上了海棠花，也就爱上了这个院落，选定这个院落，到这个盛开着海棠花的院落来居住。你住了整整26年，我比你住得还长，到现在已经是38年（邓颖超于1992年7月11日病故，终年88岁）了。”

“你看花的背影，仿佛就在昨天，就在我的眼前。我们在并肩欣赏我们共同喜爱的海棠花，但不是昨天，而是在12年以前……”

“当你告别人间的时候，我了解你。你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你的心里，跟你一起走了。但是，你没有想到，人民的力量，人民的觉醒，我们党的中坚优秀领导人，很快就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四人帮’粉碎之后，祖国的今天，正在开着改革开放之花，越开越好、越大、越茁壮，正在结着丰硕的果实，使我们的国家繁荣昌盛，给我们的人民带来幸福。”

1970年，邓颖超赠送给她的挚友、已故著名口腔科专家韩文信的儿子、也是周恩来和邓颖超的牙科保健医师、北京医院副院长韩宗琦的一张照片，那是周恩来和邓颖超老俩口在西花厅院子里海棠花开时节的合影。邓大姐在照片背面亲笔写上了三个鲜为人知的年份：1919年、1925年与1970年。这三个年份的含意是：

1919 年周恩来和邓颖超相识在天津；

1925 年 8 月 8 日在广州结婚；

1970 年 5 月，是这张珍贵的照片摄于西花厅海棠花盛开季节。

从以上的引文和邓颖超在那张珍贵照片背面书写的三个重要年份，足可以看出，周恩来和邓颖超在党内外堪称革命终身的模范夫妻，恩爱情深、忠贞不渝，充满了革命的浪漫主义色彩。

第三节

山雨欲来风满楼之时，在周恩来的一次重要外事活动场合，人们突然发觉彭真“失踪”……

1966 年 5 月，春光明媚，中南海湖边垂柳拂面，“海内”绿草茵茵，西花厅海棠花盛开，满院芬芳，蜂鸣蝶飞，中华大地呈现一派勃勃生机。

首都人民艰难地度过了三年“天灾”与“人祸”兼而有之的苦日子，许多人因长期吃的饭菜清汤光水不见油星、更没有肉味导致营养不良而得了浮肿病、肝炎。且不要说一般群众，即使能到北京医院来看病的不少高级干部同样是这种情况。

那时候，怀孕妇女受的苦更大，肚子里的小生命尽管从妈妈身上吸取了一部分营养，但仍不能满足其发育的需要。医院里许多怀孕的医护人员双下肢严重浮肿，走路时拖着两条像灌了铅一样沉重的腿迈不开步。

那时，我儿子在他妈妈肚子里足足呆了十个多月，已超过了预产期，按理说，孩子不算小了，为什么仍不觉得肚子里有何动静，真担心孩子发育不良，将来生出一个怪模怪样的畸形儿。我妻急忙赶往上海回娘家去分娩，设法买一点高价食品来一个快速补充营养法，起码可以自我安慰。

她回到上海养小囡，但亲属、邻居与同学们看见她那个足月怀胎的肚子一点没有显山露水的样子，大家对她到底是否怀了孕还真的有点儿怀疑呢。

那时，政府对干部作了一点“特殊”照顾，将干部自上而下按级别分成“肉蛋”、“糖豆”和只有“黄豆”三个级别。我是属于只有“黄豆”那个档次。我们总算得到极为有限的物质补充，就这样一天天熬了过来。大家对于那时经常断炊饿肚皮，几年闻不到一点儿肉腥味的滋味，体会极其深刻。

后来，国家经济状况有了一些好转，街上副食店里东西多了一点，就是现在人们说的“菜篮子”和“米袋子”情况稍微得到改善。老百姓马马虎虎过得去，过几天温饱与略微轻松的日子已是心满意足了，再也没有多余的念头。

那时候，人们忙忙碌碌的工作，平平淡淡地生活，倒也觉得宁静自在，心情不那么紧张，只盼着不要再来什么“政治运动”。不过，愿望归愿望，现实还是现实，老百姓无能为力，只好顺其自然。

但是，一些“老运动员”们比较敏感，他们察觉到社会生活中似有一种隐隐约约的紧张和无形的压力、犹如激战前夜那种可怕的“寂静”。

自从 60 年代中苏两党产生意识形态分歧，展开激烈的论争以来，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处于严重的分裂状态。敢于同中国共产党站在同一条战线上的“兄弟党”已是寥若晨星。以中苏两党的意识形态分歧为界线，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和兄弟党，不论是执政的还是野的，如法共、意共和日共……等几乎都发生分裂，重新站队，彼此的关系搞得十分紧张，甚至干脆中止了党际关系。因此，那时候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友谊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亦是相当珍贵或不可缺少的。

再说，那时钓鱼台国宾馆已经成了“禁区”——“中央文革小组”的办公重地设在 16 号楼，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等人都住在里边。堂堂国宾馆门前搞得冷冷清清已有多时，确是“门前冷落车马稀”了。

1966 年 4 月下旬，阿尔巴尼亚政府总理谢胡率政府代表团来华访问。我国给予了很高的礼宾规格，周恩来总理率领党中央、国务院各部委领导人到东郊机场迎接贵宾。我坐警卫车随同前往。

长长的迎宾车队直接驶到停机坪旁。迎宾队伍中有威武雄壮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

阿尔巴尼亚及各国驻华使馆官员，由学生组成的身穿艳丽服装，手捧鲜花，挥动着彩旗的迎宾队伍站在停机坪旁。当阿尔巴尼亚国宾的专机徐徐落地驶向停机坪时，欢迎队伍中立刻鼓乐齐鸣，口号声与欢呼声响成一片。

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国党政领导人款步走向舷梯旁，同谢胡率领的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表示欢迎。其时，中方领导人队伍中十分引人注目地缺少了一位重要人物——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彭真。

彭真在“海内”工作人员心目中视他为政治局“常委”。按以往的惯例，像这样重要的外事活动场合是少不了他出面的。彭真是中国共产党在“反修”战线上的杰出代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著名人物，他的地位相当突出，所以，在这么重大的国际与党际外交场合，他的出席与否已经不仅仅是“应景”之事。

当天晚上，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的国宴款待阿尔巴尼亚贵宾。此后的会谈、文艺晚会，以及 5 月初周恩来陪同谢胡到外地去参观访问等一系列重大外事活动中，始终没有看到彭真出席。这一异乎寻常的征象正向人民提示着一个信息：一场使人心悸的急风暴雨即将降临到每一个中国人民头上。

此时的我，已经在中南海西花厅这样一个政治上敏感的环境里工作近半年了。这儿的纪律很严，同事间没有人议论尚未公开的党内任何“机密”，我初来乍到，在西花厅的资格还嫩了点，自然不会知道党中央“领导层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和大多数北京老百姓一样，对正在悄然而起的“史无前例”的动乱没有丝毫思想准备。我更不会想到日后发生的这场“文革”灾难，使党、政、军各级领导干部受到严重的冲击，社会动荡不安，国民经济遭受破坏达到了崩溃的边缘，持续时间会长达十年之久！

这场动乱发展势头迅猛，波及面广泛，不少干部和群众遭受异常残酷的迫害使我惊悸不安。我所崇敬的老首长、老领导，或是敬重的老专家……突然间成了被专政的对象。对此，我始终处在不理解、接受不了、无法面对从而陷入忧心忡忡和无可奈何的痛苦之中。

但是，这一切又都是亲见、亲历与亲闻的事实，并不是道听途说。同事之间每当碰到自己解释不通的问题时，相互间只用一些中性词，如“不理解”、“跟不上形势”等言辞敷衍搪塞之，不敢正面议论。偶尔找自己认为“可靠”的、不会被“出卖”的知心朋友，如老战友、老同学在一起直抒胸臆。即便如此，我们也要避人耳目，小心翼翼地找一个较为僻静的地方去议论或者发泄一通“牢骚”。

我们这一代是属于“一切听从党安排”、跟党走到底的人，在“文革”中被批判为“驯服工具”。我们政治上比较幼稚，对于党内斗争，尤其是党内高层政治斗争，缺乏一定的认识，因而一旦政治风云骤变，便难以面对不知所措。

比如，1953年3月5日，我在上海卫生干校校园里温课，突然听到人家说：“电台广播斯大林逝世了”，尽管事先从报纸上得知斯大林病重的消息，但还是把我吓了一跳。这消息明明是真的，我却不信，不愿意接受这一事实。但是，校园里的大喇叭很快不停地播放国际歌，以前每当听到这个曲子总有一种庄严感，此时听到电台播放这个乐曲却有一种哀婉、令人伤痛的感觉，并使我若有所失。我禁不住两行热泪扑簌簌的滚落下来，好像世界末日就要来临一样。那时，哭斯大林的人何止我一个，整个校园里哭声一片！”

为什么？斯大林同我有什么关系？他，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反法西斯战争的英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面对着二战以后“北约”和“华约”两大阵营尖锐对峙的严峻局面，这个世界需要他的智慧、权威和统帅，不能没有他，要不然，这个世界还不乱了套！这，就是我，和与我同代人的信仰！

因此，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人怀有更深的感情并不稀奇。我不认识彭真，从来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但对他却极其自然的怀有深深的敬意。

在“文革”前夕，彭真身处逆境，面对惊涛骇浪的时刻，仍敢于大声地喊出“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八个字。这确是代表亿万正直的中国人民喊出的心声！这是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老战士坚定地捍卫真理的呐喊声，令我敬佩不已，永生铭记心中。当初，我看到报纸上批判“真理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正确观点时，我内心是拥护彭真的观点的，但没有勇气公开跟着说，更不敢响亮地跟着他那样喊。看来，伟人毕竟是伟人。

粉碎“四人帮”以后，彭真重新恢复了工作。他亲自主持制定了我国第一部《刑法》与《刑事诉讼法》等七部重要法律，后来又直接主持了《宪法》的修改工作。可以看得出来：彭真在将进入高龄老人的时候，用拼命工作的精神来弥补那已经丢失的宝贵时光。他为我国建成一个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他希望实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阿尔巴尼亚总理谢胡访华时，我知道彭真身体健康，精力充沛。他没有离开北京，因为他的保健医生与护士同我在一个办公室工作。我从没有听说他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北京市党政第一把手等职务有何变动或被免除。此时，周恩来代表党和政府接待重要外国贵宾来访活动的重要场合，见不到彭真出面，不合常理，不可思议。更何况，同年2月，彭真和陆定一等人出席毛泽东在武汉召集的会议，讨论那个后来被称之为“二月提纲”问题，时间不到两个月，怎么会……

那时，我奉卫生部保健局之命作为陆定一的保健医生随同去武汉。因陆定一的健康状况不大好，患有较重的冠心病伴慢性心房纤颤。出发前，我们组织心脏病专家给他会诊，提出诊疗方面的建议。

陆定一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主管文教卫生工作。他赴武汉出席毛泽东召集的会议，同机前往的还有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等几个“笔杆子”。彭真、康生等人也先后抵达武汉。大家同住在武昌东湖宾馆“百花”大院内。陆定一住的是“百花一号楼”，这是我熟悉的一所房子，我曾随董必武在此住过一段时间。

这次会议的内容就是“文革”高潮中人所共知的，遭到口诛笔伐的所谓“二月提纲”。

这是后来的事了。

到武汉时，正值初春季节。北京尚是春寒料峭、乍暖还寒的日子。然而地处长江中上游的武汉三镇已是春光一片，原野里洒满了滋润的绿色，散发出浓郁芬芳的泥土气息。美丽的东湖宾馆大院里亦是郁郁葱葱。这样的自然景象从直觉上给人带来一种春回大地、勃勃生机、暖融融的舒适及欢乐祥和的感觉。

住在东湖宾馆大院里的首长们，每天到院子里散步，沐浴在北京少有的和煦春光里。当然，在表面上看来高层领导人之间气氛融洽。其实，上层关系已经到了剑拔弩张的地步。可是，这个时候有谁能够感觉到国家政治生活中正孕育着一场严重的危机呢？

以前，每逢“五一”国际劳动节和“十一”国庆节，我在天安门城楼内临时设立的医疗保健室值班时见到过身材魁梧的彭真同志。这次有幸在武昌能见到年过花甲、气宇昂然的彭真和身材匀称、面貌清秀、待人亲切的夫人张洁清同志，与他们的随员一同到户外散步。

“你是张大夫？是北京医院的？”张洁清同志主动问我。

“是，我是北京医院内科医生。”我简单地回答。这是我第一次同她讲话。

“听你的口音是南方人？南方什么地方？”

“我是上海人。”

“上海人都聪明、机灵。”她夸着“上海人”，我未敢吱声。

彭真同志的医疗关系在北京医院，他的保健医护人员是我的同事，彼此都熟悉。她大概是从身边工作人员那里得知我的姓名，领导人见面彼此打招呼，边散步边说话，一切都很正常。不过，从未见到康生同彭真、陆定一等人一起散步。那时，我只知道康生是个“大笔杆子”、“党的理论家”。他大概忙着写文章没有时间到户外来活动吧？我自然不可能会有别的想法。

住在东湖宾馆期间，偶尔在院子里遇见康生；只见他严肃、冷峻、少言寡语，一副不好接近的神态，同彭真和陆定一他们那种和蔼可亲、平等待人的态度相比，迥然不同。1972年初康生患病后，周恩来到钓鱼台8号楼去看望他，我常跟随左右，有机会见到康生，但从未与他说过一句话。

除了上面提到的原因外，康生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顾问，经常参加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红卫兵”及造反派组织。在许多场合，康生的讲话显得特别“左”，根本无法让人理解。我清晰地记得他在多种场合说过：现在，无论哪一个地区、工厂、机关或部门，凡是那里共产党员多、劳动模范多、共青团员多，这些地方受刘少奇的“黑修养”（《论共产党员修养》）毒害就深、保守势力就大、运动的阻力就大，因为他们是既得利益者，自己不革命也不让别人革命！你们要勇敢地冲破这些重重的阻力，造他们的反，自己解放自己！康生用他那改变不了的浓重山东口音一个劲儿地煽风点火，鼓动造反派起来“革命”，唯恐天下不乱。我听了他的讲话，心里感到别扭，

很不舒服，觉得他哪里有点“革命老前辈”的味道？亏他还是个党中央领导人呢，他是要把全国各地的党组织都搞垮，真是难以置信。

在同一个会场上，周恩来的讲话总是与“中央文革小组”那一伙人唱的不是一个调。他讲话离不开“团结”两个字。他从不轻易给哪一个组织或派别贴上“革命”还是“保守”的标签。他常说：我们都要好好学习毛主席著作，正确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理论武器，要理论联系实际，都要学习对方的长处，不要互相攻击、乱扣帽子、随便说人家是“保皇派”，这样不好嘛！不利于团结的话少说，不利于团结的事不做。我相信，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干部和群众都愿意进步、愿意革命，你们要团结干部和群众的大多数，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你们要从团结的愿望出发，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在新的基础上加强团结！这些是周恩来在“文革”动乱期间，接见无数次造反派中常用的、典型的语言，听了顺耳、叫人舒服、令人信服，即使造反派心里不服也没辙。

不过，我在武汉时绝对没有想到过“中央领导层”出了什么新问题。他们白天到毛泽东处开会，晚上看电影，也有到毛泽东住地参加舞会。到达武汉后，只要毛泽东那边晚上有舞会，陆定一处又能离得开，我总不放过看看毛主席的机会。但我未看见彭真、陆定一和康生等领导人一起到毛泽东住地参加舞会或看电影的情景。只见过湖北省委第一书记王任重等人到毛泽东处作陪，可能是出于礼貌和尽地主之谊吧。

在武汉期间的一天上午，湖北省委有几个领导同志（不是王任重书记，亦不是张体学省长）到东湖宾馆看望陆定一同志。因为，当地有关人士对“八七”会议会址和参加者的情况说法不一，他们知道陆定一是“八七”会议参加者，他们相信陆定一能帮助他们搞清楚。陆定一等人看了两个地方，来到其中一处二层楼上一间不大的房间里，他向地方领导人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与解释，大家满意而归。

大约是到达武汉后的第二个晚上，陆定一身边工作人员向我提议：晚上陆部长可能睡不好觉，你可以根据情况主动给他加点安眠药。陆定一住在东湖宾馆百花一号楼，房子的格局是从走廊开门进入他的办公室，卧室的房门与办公室相通。

陆定一的生活习惯是晚上睡得晚，第二天早晨起得也晚。这天午夜 12 点左右，我开门进了他的办公室，房间里厚厚的暗红色丝绒窗帘都已拉上，办公桌上的台灯亮着，绿色灯罩将光线背向卧室，故室内光线昏暗。卧室房门关着，但未关严，故意留有一丝小缝便于随员出入卧室时不至于开门发出响声。办公桌上有一只热水瓶、一个茶杯，我走近办公桌，只见台灯下有一张不带格的普通白纸，纸上用铅笔赫然写着“豁达大度”四个大字，见到这几个字使我怦然心跳。这是怎么回事？从字面看，首长显然是遇上了烦心的事情，他写此字用以自警、自勉与自慰。我哪里知道，这些都是后来爆发“文革”动乱前夕，中央几位重要领导人早已遇到了麻烦的信号，是打倒彭、罗、陆、杨的前奏！怪不得，秘书向我交代：晚上陆部长可能睡不好觉！

我轻轻推开了卧室房门，侧耳细听室内陆部长睡着了没有，听了约两三分钟未闻一点鼾声，谅必没有睡着。我把事先准备好的装有安眠药的小药瓶放在茶杯旁，又轻轻关上卧室房门，悄然离开办公室回到自己房间。但此刻，我躺在床上辗转反侧不得入眠，心中茫然一片。

我们已经历了 1958 年的“大跃进”；1959 年的批判“彭、黄、张、周”

（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和周小舟）的庐山会议，至此才六年多，现在上头又出了事儿？

我还清楚地记得，1966年3月8日，河北省邢台地区发生强烈地震，周恩来闻讯立即赶往灾区视察工作，他有时白天，或是夜间在他乘坐的专列上跟彭真通电话保持工作联系，可见，彭真在党中央的地位之重要。我就想不通，才过了几个月啊，还是这个彭真难道便出了“问题”？如何解释？谁能告诉我？

回想60年代前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再同那几年国内政治形势联系起来，便逐渐体会出“一点道理”来。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领导苏联共产党以来，中苏两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渐渐产生原则性的意见分歧和争论，中国共产党对苏共采取严厉的批判态度，称苏共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而沦为修正主义。他们不再是从前的“老大哥”而是以“老子党”自居，不尊重兄弟党和兄弟国家，要求别人跟着他们的指挥棒转；他们对外实行大国沙文主义、扩张主义和霸权主义。中国共产党先后发表了“一评”到“九评”的巨篇宏论同苏共进行了公开的论战，最终导致两国关系迅速恶化，甚至发生了珍宝岛军事冲突事件。

毛泽东担心中国共产党内出现赫鲁晓夫式的人物，使我国的社会主义蜕变为修正主义，发生“国变颜色”、“党变修”的根本性大问题。

早在1962年9月，毛泽东在八届十中全会上提出“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1965年，在扩大的中央常委会上他不无忧虑地向大家指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很可能出，这是最危险的。”后来，他经常讲、到处讲“修正主义”和“阶级斗争”问题，到了1966年，他亲自发动并领导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进一步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的基本观点来看待和处理一切社会政治问题。

那位怕风、怕光又怕水、病病歪歪长年养病不工作，语录不离手、万岁不离口的接班人林彪，借机将个人崇拜推向新的高潮。他亦步亦趋、推波助澜，他以“高举”、“突出”毛泽东思想、口口声声称毛泽东是“天才”为手段，达到他不可告人之目的。

林彪一伙人只讲空头政治、大话空话，不做实际工作；只务虚、不务实。他们破坏了党的优良传统与作风，毁坏了党在人民中的形象，降低了党的威信，使党脱离了广大群众；林彪同“四人帮”沆瀣一气使无数干部与群众遭到残酷的迫害。他们先在党内外作了充分的舆论准备，并找机会采取行动。比如，1965年11月，叶群便是在这样一种政治大背景下携带林彪的亲笔信神秘地赶到杭州毛泽东在西子湖畔的汪庄别墅，当面诬告了罗瑞卿。毛泽东轻信了谗言。12月，毛泽东在上海召开中央紧急会议批判罗瑞卿，林彪等人借机攻击罗瑞卿、整垮罗瑞卿。罗瑞卿在会上没有发言的机会，有口难辩。

大的政治气候形成之后，1966年5月，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免去了彭真和陆定一等人党内外一切职务，刘少奇和邓小平的处境也十分艰难。

是年秋末冬初，彭真突然被人从家里揪走，堂堂北京市的首脑人物不知了去向，霎时间，彭真“失踪”了的传闻迅速传遍北京和全国，难怪，1966年“文革”动乱开始不久，国家主席刘少奇、总理周恩来和总书记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向参加会议的干部和群众检讨有关“工作组”问题的“错误”时

也只得违心地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像我这样的一般群众怎能理解发动这场“史无前例”动乱的“真谛”？

第四节

周恩来被卷进了“文化大革命”；刘少奇在天安门城楼被冷落；“中央文革”就像一只大筛子；周恩来说：“不要侮辱少奇同志的人格嘛！”

毛泽东要亲自发动、亲自领导并亲自指挥那一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恐怕是谁也阻挡不了，但这场运动所造成的灾难性后果，是包括周恩来在内的中央高层领导人所始料未及的，也都被动地卷进去。那时，周恩来的思想认识总跟不上局势的发展。他常用以往历次政治运动的经验来处理“文革”引发的种种突发事端，仍希望将“运动”置于各级党委领导与控制之下，不准“越轨”。1966年夏天，人民大会堂那次著名的万人大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都说：“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这是三位重要领导人说的实际情况。

1966年5月，党中央为了确立“文化大革命”的指导方针，在北京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在外地没有参加，会议由刘少奇主持。但是，会议的重要内容是根据4月毛泽东在杭州亲自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上决定的。会上，根据林彪与康生等一伙的指控，批判了彭、罗、陆、杨，给他们扣上了“反党集团”的帽子。

指导“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纲领性文件——《五一六通知》，是毛泽东亲自主持起草后，让刘少奇在北京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通过。

《五一六通知》中严厉地批评原“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彭真为主要成员）是为“资产阶级复辟作舆论准备”，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中央认为必须予以撤销。同时，“通知”决定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由陈伯达任组长，副组长为江青、王任重、刘志坚与张春桥，康生任顾问；后来、陶铸到中央任政治局常委，他又兼任顾问工作。

事隔不久，中央又决定，在陈伯达病假或离京外出期间，由江青代理“中央文革小组”组长之职。所谓“中央文革小组”实际上是取代党中央书记处的地位，其权力还要大得多。

这就使江青红得发紫、地位更加巩固、权力无边，“文革”小组成员中很快形成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与戚本禹等人的一个能量极大、危害严重的团伙。于是，一场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混乱与痛苦的“文革”迅猛异常地展开了。

5月下旬，那位一向称病不工作、“韬光养晦”多年之后突然杀出来的康生，见时机已到，便指使北京大学聂元梓等人贴出大字报，叫嚷要“打破修正主义的种种控制和一切阴谋诡计，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牛鬼蛇神，一切赫鲁晓夫式的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毛泽东批示，将此“大字报”由新华社全文广播，在全国各报刊发表。

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一炮打响，她们揪斗北大领导陆平及彭佩云，

开了全国揪斗领导干部的先例。顷刻间，全国各地大专院校掀起揪斗狂潮，冲击学校党委、批斗专家、学者、权威，造成一片混乱局面，不堪收拾。“文革”高潮一旦到来，造反派们立刻走上街头，冲向世界，“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恶浪滚滚、异常迅速地席卷全国各地。

6月初，毛泽东批准张承先率工作组到北大领导“文化大革命”。这期间，刘少奇和邓小平曾专程去外地向毛泽东汇报工作，毛泽东委托刘少奇在京主持日常工作，并处理“文革”运动有关问题。

6月上旬，根据各院校的要求，刘少奇在京召开常委扩大会议，决定由中央各部派出工作组进驻北京各高等院校，协助学校搞好运动。但是，形势的恶化已是不可阻挡，到了这步田地，工作组亦已无能为力。

7月，毛泽东曾致函江青说：“现在的任务是要在全国基本上（不可能全部）打倒右派”。“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但是，刘少奇等人根本不知道“文化大革命”究竟该怎样进行而陷入困境。至此，刘少奇只得恳请毛泽东返回北京主持大局。

毛泽东回京听取各方面的情况汇报后，他对于派工作组进驻大专院校之事表示出强烈的不满。他极其尖锐地指责工作组起了破坏作用，阻碍运动……有人镇压学生运动，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人都没有好下场。

江青和康生等人知道时机已到，便一下子跳出来，气焰十分嚣张。他们到各院校煽风点火、说刘少奇镇压学生运动……向社会提供了许多假情况，制造谣言，将斗争的矛头直接指向国家主席，迫使刘少奇作自我批评，但他对此仍持保留意见。

7月29日，北京市委召开大会，宣布撤销全部工作组的决定，毛泽东亲自到会与群众见面。刘少奇在大会上说：“怎样进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你们不大清楚，不大知道，你们问我们，我老实回答你们，我也不晓得。”

正是盛夏季节的另一天晚上，在人民大会堂大礼堂的一次万人集会上，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先后都说了同一句话——“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于是，各单位的工作组便一风吹，全部撤走了。各大专院校形成“踢开党委闹革命”、“停课闹革命”的局面。广大群众议论纷纷，出现了极大的思想混乱。

“中央文革小组”成立后，将办公地点设在钓鱼台16号楼。自此，16号楼天天开会，会议都在晚上7点钟左右开始，会议时间都很长，大多开到凌晨三四点钟，一直开到天亮者也屡见不鲜。这个会议名称叫做“中央文革碰头会”。会议由周恩来主持，除“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外，几位副总理、“中央军委文革”小组组长徐向前与聂荣臻、叶剑英等老师以及萧华、杨成武等人也参加会议。每天会议开始后，随员们各找地方或坐或躺，随遇而安东倒西歪地在那儿睡觉，小伙子熬夜都不如首长们，我也一样。

“中央文革碰头会”很像一把“大筛子”，随着“文革”运动的不断发展，被打倒、揪斗的人渐渐增加。陶铸是党中央政治局常委，是继刘少奇和邓小平之后被打倒的，也是级别最高的领导人之一。

嗣后，被打倒的人数陆续增加，像陈毅、谭震林、聂荣臻、徐向前及萧华等人都被批斗，叫喊着要“倒”他们。后来，又是林彪和“四人帮”一手策划的所谓“杨、余、傅”（解放军代总参谋长杨成武、空军政委余立金及北京卫戍区司令傅崇碧）事件，现在已记不清楚孰先孰后的次序了。经过这把“大筛子”过滤以后，剩下来参加“中央文革碰头会”的人日益减少。

“文革”时期，周恩来保护老干部、民主党派负责人、知识分子的事例实在太多。运动开始时，周恩来便成天忙着“救火”、“救人”，保这个救那个，为此，“四人帮”批判他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保皇派的黑后台……”

其实，在我看来，周恩来对“文化大革命”的思想认识同所谓的“二月逆流”们本无多大的原则差别，只因他处的地位特殊，要求他不能硬顶、逆风而上，否则就没有缓冲及转圜的余地，国家与人民的损失会更加惨重。因此，历史赋予他的使命要求他必须审时度势、谨慎从事。关于“文革”中周恩来的处境艰难与殚精竭虑地为党和人民事业所作出的重大贡献，历史已有公论。1981年6月，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写得十分明白：“周恩来同志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鞠躬尽瘁。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处于非常困难的地位。他顾全大局，任劳任怨，为继续进行党和国家的正常工作，为尽量减少‘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损失，为保护大批的党内外干部，作了坚持不懈的努力，费尽了心血……”

由于工作需要，每年“五一”“十一”我都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医疗保健值班。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登上天安门城楼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我见到城楼大殿里的布局仍同往常一样，但仔细观察，便发现座席安排及人际交往方面有明显异常。

从前，大殿正中面南坐北和两侧摆着大沙发，沙发背后挡着屏风用以隔音及挡视线；大殿进门的东西两侧各摆着一长溜铺有绿呢或白桌布的长条桌。按惯例，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和邓小平等七个政治局常委坐在这三面大沙发上。西侧的长条桌为中央委员而设，东边的为民主党派与党外民主人士专用。

这一次的情形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毛泽东独自坐在中间沙发上吸烟，有时林彪走过去坐到他跟前说几句话；朱德偶尔坐到右侧沙发上小憩，但不见其他领导人坐到那三面大沙发上去。刘少奇独自站在为中央委员设的右侧长条桌旁，他的身旁只有一个警卫人员跟随。更为引人注目的是，往日在这种场合必有许多大人物围着他说话，起码会主动走过去跟他打招呼，如今的刘少奇显然受到了冷落，从他面前经过的人，亦未见有谁理睬他，这肯定与1966年8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上批评了刘少奇有关。那次会议之后，毛泽东写了一张《炮打司令部》的大字报，主要是针对刘少奇，并向社会公开发表。刘的地位下降了，人们疏远他、同他保持了距离。真可谓“事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

不久后，“文革”狂潮乍起，大街上贴出了“打倒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刘少奇！”“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刘少奇！”的大标语。接着，几乎是一夜之间大街小巷、铺天盖地贴满了攻击刘少奇的大标语，有的标语在刘少奇的名字上还用红墨水打“×××”，或把刘少奇的名字倒着写……

一天，周恩来从外面回到西花厅，生气地跟我们说：“你们都看见了，大街上那些大标语与口号上、把刘少奇名字倒着写，打叉叉，这像什么话嘛！这样做不文明啊！少奇同志的问题还没有定性嘛，即使定了性，我们也不能侮辱他的人格嘛！”看来，周恩来对此气恼极了。其实，我们坐在随车上的人早就看见这种大标语了。

同年10月的一天下午，周恩来把我叫进他的办公室，吩咐道：“你去看看少奇同志，他现在怎么样了？”在这之前，我虽在一些工作场合见过刘少奇，但跟他不相识。听说刘少奇向来少言寡语，不苟言谈。

我到了刘少奇在中南海的住所“福祿居”，院子里悄然无声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萧瑟冷清的景象，已不是我所想象的那样——“主席府”应当是警卫森严，武装或便衣岗哨林立，若有人来到院子门前必定会上来盘问。此刻，哨兵是有的，他只是问你是哪个单位的，找谁？我向哨兵说明自己是西花厅的工作人员，他未加干预便放我进了院子。院子内毫无生气，没有看见刘少奇的夫人王光美。我自己找到了一位穿便衣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我是总理办公室的，要见见少奇同志。他走在前面引我到刘少奇办公室门口，门敞开着。

“我叫张佐良，是周总理的保健医师。总理要我来看望少奇同志，向少奇同志问好。”那时，我穿着军装，故进门见到他就行了个军礼，向他报告道。

“谢谢总理的关心，总理怎么样？他好吗？”刘少奇说。

“总理还好，就是工作太忙，休息太少。”

刘少奇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家里有几个人之类问题。我见他没有什么重要的话题，便告辞。自然，刘少奇遭到如此严重的打击，他身处这样一种艰难的境况，实际上是软禁状态，他还会说什么呢？

“请少奇同志保重，我回去了。”

“请你代我向总理问好，请他保重。”刘少奇仍坐在沙发上平静地这样说。

我即站起身来向他行了个军礼，便返回西花厅向周恩来复命。

第五节

贺龙晕厥天安门城楼；周恩来请贺龙夫妇住进西花厅

贺龙是周恩来保得最早的一位元帅。那是“文革”刚开始时，一次，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贺龙也在城楼上。我恰好站在距贺老总不远处，见到有人同他说了几句话，贺老总的脸色立刻变白，额头沁出了汗珠，并且有点站立不稳，好像要昏倒的样子。在天安门城楼值班的医疗保健组人员立刻过去将他扶进设立在大殿里的临时急救室内躺下，给他测血压、吸氧气、作心电图检查及相应的治疗措施，待情况稍稳定后便护送他离开天安门。

事后听说，那是国家体委内部闹派性斗争，为了向柬埔寨王国派乒乓球代表队，内部意见不统一，产生了矛盾冲突，荣高棠遭造反派围攻。贺龙得此消息非常着急，怕事态扩大难以收拾，焦急之下便发生了前面昏厥的情形。

贺龙年事已高，长期患有较严重的糖尿病和心血管病。贺龙在天安门城楼上昏厥的事很快被周恩来知道了。不久，周恩来便接贺龙与夫人薛明住进中南海西花厅，安排在接见外宾的前厅里。前厅的门窗关得紧紧的，双层窗帘拉得严严实实，此事对内对外都绝对保密，除周恩来与邓颖超外，为了照顾好他们两人的生活，只让警卫人员及保健医生知道这个绝密情况。我们曾按照周恩来的嘱咐，看望过贺龙，为他测量过血压并送过药物。那时，贺

龙心情沉重，面部表情忧郁，彼此见面，只打招呼，没有说过话。贺老总当然知道，周恩来是为了他的健康才安排保健医生照顾他的。可是，之后在什么时候、为什么、怎样悄悄地转移的，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这一切，我都不清楚。直至 1976 年 10 月揪出“四人帮”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才听到一些传闻。谅必当时周恩来定有他的难处，迫于无奈只好出此下策，让贺龙离开西花厅。若是周恩来胆小怕事，不愿得罪上面，他一开始本可以对此不顾。周恩来是十分重感情的人，每每在危急关头挺身而出庇护老同志。

但是，必须看到，周恩来是伟大的政治家，他既重情谊，却又要顾大局而不可意气用事。自从中国共产党确立了毛泽东的核心领导地位之后，周恩来始终把以毛泽东为中心的团结作为最重要的政治原则，有时不得不违心地服从，甚至不惜个人的形象受到损害。

1975 年夏，在八宝山贺龙骨灰重新安放仪式上，已经身患癌症且已到了晚期的周恩来，在有人搀扶着走进八宝山礼堂时，他，声泪俱下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薛明啊！我来晚了……我没有保护他……”长喊，真是催人泪下，每一个在场的人无不为之动容。“我的时间也不多了……”紧接着，周恩来又这样告诉薛明，然后，他们痛哭拥抱。

周恩来的喊声中充满了手足之情，悲切之音，人们亦不难品味到个中无法细说的情由。

邓颖超说，恩来在告别人间时，是忧党、忧国、忧民，把满腹忧恨埋藏在心里带走了。知夫莫如妻，邓大姐应该是最了解，也是最有资格这样说。我在西花厅工作十年，对此亦有些感受。

